

第3期 2010.10 出刊

# 新视界

## NEW VISION

学人访谈 · 访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张睿壮教授 P01

时事评论 · 2010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观察 P09

青梅煮酒 · 聚焦中日钓鱼岛冲突 P27

他山之石 · 国际关系研究的定量数据库及其应用 P40

南开印象 · 南开国关的印记 P47

愿同学们把这份  
对国际的热情保持  
下去。

张着化  
09年10月

新视界

NEW VISION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主办

2010年10月 第3期

(双月刊)



\*\*\*\*\*About us\*\*\*\*\*

主编：陈冲 高婉妮

副主编：

袁婷 李金潼 李文婷 阮艳婷

编辑部成员：

于洪宇 徐芳宇 刘若楠 狄英娜

董柞壮 龚秀娟 陈永 赵岩 张奕

\*\*\*\*\*Contact us\*\*\*\*\*

Website: <http://nknewvision.yolasite.com/>

Blog: <http://blog.sina.com.cn/nkirnewvision>

E-mail: [nkirjournal@gmail.com](mailto:nkirjournal@gmail.com)

**注：未获本刊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媒体不得转载本刊原创内容。**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

## 主编的话

这个秋天，正如之前或往后的无数个秋天一样，嘈杂而又有一丝冷清。

钓鱼岛附近的“撞船事件”让中日关系再起波折，两国民间敌对情绪高涨，反华浪潮与反日游行此起彼伏，“遥相呼应”，由此引发的“民族主义”争论再起波澜。中国正在崛起，吸引了国际社会诸多关注，但在如何定位自身地位上亟待共识。大洋彼岸的美国，中期选举闹得沸沸扬扬，奥巴马政府的“变革魔咒”历经两年，收效甚微，“钟摆效应”引人注目……

在本期《新视界》中，著名国际问题研究专家张睿壮教授精彩阐述了民族主义的概念与内涵，引领我们穿越嘈杂，探寻“国族”的前进与发展；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刁大明先生追踪了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在对选举结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初步预测了它对中美关系的可能影响；国关学子常璐璐同学以中国崛起为背景，介绍并评析了《中国寻求国际地位：国际关系的重新调整》一书，希望能更好地认识中国的崛起；远在加拿大里贾纳大学求学的南开校友胡悦同学以亲身经历告诉我们，要为中国人自豪，需要的资本还有很多；曾求学于南开的复旦大学博士左希迎同学回首南开国关的印记，闲谈之中充满了感怀……

不同的侧重点，却都在字里行间体现了同一种情感——那就是热爱。诗人艾青曾写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想无论是为民族主义正名，还是在海外无法为中国人的身份感到自豪；无论是走到大街上进行反日游行，还是坐在书斋里煮酒论英雄；无论是早已离校的学子怀旧，还是刚入学的学生们感新，都体现了一个主题：那就是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因为对国关有爱，才会有对师长爱其高却怨其险的真情告白；因为对南开有爱，才会在前行的道路上总以南开的印记而自豪；因为对祖国有爱，才会在激烈的世界竞争中为祖国担忧，为民族呐喊……

深秋的校园里，满地的树叶在风力的作用下层层滚动，宛如浪花前仆后继。古罗马哲学家皇帝马克·奥勒留曾说过，人是被风驱散在地上的树叶。作为一片叶子，哪怕最终逃脱不了被风吹走的命运，也要在那之前热爱自己的那片土地——因为它是我们栖身的地方。

《新视界》，给了我们一种爱的表达。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

## 目录

主编的话 .....	(I)
学人访谈	
为民族主义正名	
——访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张睿壮教授 .....	张睿壮 (1)
时事评论	
2010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观察 .....	刁大明 (9)
书山有路	
权力、认同与中国的国际地位 .....	常璐璐 (16)
海外南开人	
Nothing Honored, So .....	胡悦 (25)
青梅煮酒	
中日钓鱼岛之争 .....	(27)
国关人物	
彼得·卡赞斯坦 .....	(37)
他山之石	
国际关系研究的定量数据库及其应用 (一) .....	陈冲 刘丰 (40)

## 南开印象

南开国关的印记 ..... 左希迎 (47)

南开初体验 ..... 曹滢 (49)

初识南开 ..... 吕海 (50)

新书架 (三) ..... 李金潼 龚秀娟 (51)

我想对您说 ..... (54)

## 院系活动

学术交流 ..... (56)

师生活动 ..... (57)

更正启事 ..... (58)

国际关系系论文注释体例 ..... (59)

征稿启事 ..... (63)



## 为民族主义正名

——访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张睿壮教授

【编者按】9月7日上午，中日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发生了“撞船事件”。随后，日本方面非法扣押了中国渔船船长，中日关系急转直下。日本国内右翼势力趁机掀起反华浪潮，与此相对，中国民间反日情绪高涨，尤其是中西部的一些城市先后发生了反日游行。本刊就此次民间民族主义的表现采访了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南开大学张睿壮教授。张老师从界定民族主义的概念出发，澄清了人们对民族主义的一系列误解和偏见。他还指出，中国应大力弘扬以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为核心的民族主义，增强民族凝聚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人物】张睿壮，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关系硕士，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政治学博士。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教授、博导，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华美国学会、天津政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治学会理事；北京大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美国多米尼肯大学、韩国天主教大学客座教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访问学者。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有：国际关系理论与当代国际关系、美国外交政策与中美关系、社会科学方法论等。

《新视界》：张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撞船事件”发生以来，日本施用国内法律处理中方人员等行为了恶化了中日关系，我国民间反日情绪随即高涨。请问，您觉得日本此番行为的目的何在？您又如何看待中国民间在此次事件中凸显的民族主义情结？

张老师：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谈话题目。因为就事件本身来说，我知道的不比你们多，现在能够作为依据的信息也很少。如果从中发挥出太多，那纯粹是臆测，也没有太大的价值。外交上有些事件实际上是边走边演，不一定会按照一个定好的脚本进行。因此像“日本此番行为的目的何在？”之类的问题并不是总有答案的。因为这样就把日

本看成了一个做事必定有目的有预谋的自主行为体，其实不一定，可能有偶然因素的影响。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看见中国的渔船可能就有自发的反应。两船发生冲撞，强势一方就有可能扣留对方人员。另外，中方人员是地方检察署（地方司法机构）释放的，此举与日本政府有什么样的关系，没有人能说清楚。至于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凸显，我想以这次钓鱼岛事件为引子讲讲民族主义的问题。钓鱼岛这个问题是一个民族主义情绪可以集中爆发或者表现的一个机会，所以每次钓鱼岛的事情一出，网上关于民族主义的争论就特别激烈，所以我想就这个钓鱼岛事件谈谈民族主义问题。

《新视界》：那么您认为应该如何界定“民



族主义”？它在中国的学术界和舆论中有怎样的地位呢？

**张老师：**我先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做一个区分，然后再讲讲如何界定民族主义。现在很多人在谈论民族主义，但是事实上对民族主义是什么、包括哪些内容却不是很清楚。关于这个问题，西方有一句熟语，既简单又能说明问题，说爱国主义是 love the country as it is（爱国家本来的样子），民族主义是 love the country as it should be（爱国家应该的样子）。爱国主义就是不管国家现在是什么样子，你都爱它；而民族主义就是对国家有一个看法，有一个主张，你会按照这个主张要求，按照对民族的意象去改造它。区别就在这里。

在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最近的一二十年里，民族主义就一直受到所谓的“自由主义”学者不遗余力的攻击，因此我想为民族主义正名。这些人把民族主义叫做极端民族主义、病态的民族主义、疯狂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狂热等等，用很多贬义词来修饰民族主义。在中国这二三十年，所谓“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思想界是占主流的，主要的新闻媒体和比较严肃一些的出版物基本上也是自由主义占据着。尽管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自由主义的学者越界了，走过了头会受到整肃，但是自由主义的思想仍然是占据主流的。因为他们的影响很大，因此民族主义这个词现在在民间、在媒体、在网上都是一个带有负面意义的字眼，是一个贬义词。我说的是一般的情况，不排除在网上还有一部分人为民族主义说话，主张民族主义的观点，但是这部分人也是被攻击的对象，比如被称为愤青、爱国贼等等。我想说的是，虽然有些网民表达民族主义情绪的时候

用了过激的语言，或者提出了一些过激的主张，但是这些言辞激烈、观点偏激的网民不管在哪一边，自由主义一边，还是民族主义一边；不管在哪个国家，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是存在的。对这些人你可以忽略不计，可以不要把他们当真。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些主义、主张搞清楚，在网上多半是盲目地骂人，或者互相吵架、谩骂，这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不能把这些偏见当成民族主义去批判、去谴责。当然，确实有一部分人是在坚持民族主义的观点的。但是，在我看来即使是这些人也没有清楚地表述民族主义的观点，一部分的原因是我们对民族主义的讨论本身也是受到限制的。

所以，我想如果要为民族主义正名，首先要搞清楚民族主义到底是什么。其实民族主义可以很简单地表述出来。虽然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定义可以写一本书，能罗列几十种定义和不同的文献考据，但是第一我认为一般人没有兴趣在那里头跟着它绕，第二也没有什么实用价值，所以我就想提出一个非常实用的定义，我认为民族主义就是坚持民族认同与忠诚，维护本民族尊严、权利和利益的主张或者立场。

**《新视界》：**您这个定义非常精辟。那么请问，您认为民族主义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呢？

**张老师：**民族主义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就是民族的认同和忠诚，第二方面就是民族自信自强；第三方面就是民族利益至上。民族主义的内容说白了就是这么简单，没有太复杂的东西。

**《新视界》：**民族主义的主体是“民族”，那么您觉得我们现在所说的“民族”是什么范



国上的呢？

**张老师：**说到民族主义，我可以讲一下我们现在讲的民族是什么样的民族。我们现在讲的民族就是国家民族，这和我们传统上讲的单一民族是有一些不同的。大家都知道，在历史上，以民族为基础形成了民族国家，但是民族国家往往不是单一民族的，而往往由于历史等种种原因，形成了多民族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和国际社会中是一个基本单位，这是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改变的。很多国际关系理论的流派一直在宣扬主权过时、国家过时等观点，但是没有人能够改变国家仍然是最基本单位的事实。因为所谓的主权过时、边界过时显然是和现实脱离的。比如说，一个人要走出国境，如果你不去别的国家的大使馆申请签证，就一步都迈不出去。如果真的是像有些“自由主义者”们宣扬的那样，主权过时了，边境过时了，我们同住在一个地球村里，我们都是世界公民，那么在村子里串个门应该很容易。但事实是如果你去北京的外国大使馆签证，可能很多都签不下来，或者至少你不签证的话一个国家也去不了。

国家还是最基本的单位，因此这就产生一种需要，一个国家里的人是被绑在一起的，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个事实。它就是这么个事实，他们是被绑在一起的。因此以国家为界，其中尽管可能有多个传统意义上的单一民族，就像中国现在有 56 个传统民族，但是又以中国为单位、为界，又圈出一个 56 个民族放在一起的新的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就是国家民族，有人简称为国族。这种现象其实是从现代国家有了之后就一直存在，也不是什么新的现象。比如说像美国人，美利坚民族来自五湖四海、世界各地。他们有不

同肤色、不同种族，但是他们聚在一起，并且有一个共同的纽带把他们绑在一起，那就是美利坚民族。美国人出来都会说“我是美国人”，然后细分才会说“我是意大利裔美国人”，“我是波兰裔美国人”，“我是越南裔美国人”等等。又比如说，英国人出来说“我是英国人”，其中也包括了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和北爱尔兰人，但是他们都是英国人，同样中国人也是如此。我们现在在国际关系中说的民族实际上是国族。所以，在网上有人担心，他们认为如果提倡民族主义是不是会给分裂势力提供理由，我觉得不会，因为我们讲的民族和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以国家为单位的。

**《新视界》：**您能具体讲讲您刚才提到的民族主义所包括的三个方面吗？

**张老师：**第一个方面是民族认同与忠诚。实际上就是你自己的身份和认同，你是不是认为自己是这个民族的一分子。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在国际政治中，你和谁是一拨的；在发生国际冲突的时候，你跟谁站在一起，这是一个身份，一种认同。这是民族主义的第一方面。有人说“这还不简单，我肯定是中国人”，但这实际上不简单。因为有的中国人实际上是不认同中国的，有的人非常恨自己是中国人，非常遗憾自己这辈子投生为中国人。现在有一些“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就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他们的理念就是地球村和世界公民。“自由派”里面还有好多“一夜美国人”。“一夜美国人”，就是 9·11 的时候，大概有上百人，签署一份声明表示对美国遭受恐怖袭击的同情，那份名单相当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名人录。他们表示支持美国、同情美国、和美国站在一起，





这是一个方面的内容；另一方面就是把自己的同胞臭骂一顿，用非常尖刻非常恶毒的语言，漫骂当时在网上对美国支持以色列打压巴勒斯坦的霸权行径表示质疑的中国人。对一切反对美国霸权的人破口大骂的不是那些无知的网民，而是知识界的所谓“领军人物”。这些人在民族认同和忠诚上做出的选择是自觉的、明确的，当然美国那边接不接受这种硬贴上去的“认同”又是另说了。

还有一个更极端一点的例子，像原来在北京几所大学教过书的某副教授，他在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写了一首长诗名为《致美国兵兄弟》，表达了他和美国人站在同一立场的意愿。他认为美国兵是为了一个崇高的事业，是为了解放伊拉克人民、为了自由民主而战斗，所以“如果有来生，当兵要当美国兵”，这是他的原话。然后他还模仿中国一部叫《英雄儿女》的电影里的主人公王成最后在阵地就要失守时说的一句话，“向我开炮”，牺牲自己来引导我军炮火。他要对美军的精确制导弹喊“向我开炮”，表示他愿意为美国的崇高事业捐躯。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

社会上也有不少对身份和认同产生动摇和怀疑的现象。前不久的电影《建国大业》参演的一百多个知名演员中有三十来个是外国国籍，有美国、法国、英国、瑞士、德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另外还有拿香港身份证的。网友调侃说，这叫“八国联军打造《建国大业》”。如果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这种选择无可厚非，他个人有他特殊的处境和理由。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来看的话，恐怕就有问题了。这说明我们的民族出问题了，这个民族没有凝聚力，没有向心力。这三十来个加入外国籍的演员都是所谓的精英阶层，在中国属于既得利益集团。

现在演员在中国的待遇是很好的。有钱就不用说了，而且还有名气有地位等等，该有的他们都有了。就是这样他们还是不满意，要给自己留条后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没有安全感，认为这些东西随时可能失去。所以要找外国国籍来保护他们。这些演员因为名气大被人家发现是没办法的事，但是更多出走国外、加入外籍的是普通老百姓不知道的——包括相当一部分官员在内的所谓“社会精英”的家属和子女。当然官员本身不能入外国籍，但是他会想办法把自己的家属、子女、财产都转移到国外，然后让他们入了外国籍。

如果我们社会中最有钱有势、最有名有地位的精英，仍然觉得自己需要有一个外国的国籍来做保护伞的话，那就说明我们的民族忠诚和认同上出了很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设想一下，如果今天中国碰到危机了，或者说得再严重一点，中国碰到战争了，在所谓“自由主义知识精英”中会有多少人站在中国一边，有多少人会“保持中立”，又有多少人会站到敌国一边？想象一下今天八国联军打入北京会是什么景象？会不会出现沿着长安街站着热烈欢迎的人群，每个人都拿着自己投靠的国家的小旗欢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场面？会不会？可以说这已经不是太过离奇的假设了。

刚刚所说的是第一条民族认同和忠诚，是关于你是谁，你效忠于谁的问题。还有民族自信与自强，这是第二条。我们的民族自信心早就非常弱了，早在鲁迅的时代，鲁迅就批判中国人丧失了民族自信心。从那时直到现在，有些人就认为中国人是一个劣等民族，所以需要外国人来治理，中国人自己是没办法治理好的。比如那个刚得到诺贝尔奖的文人，他有一个很著名的论点：香港当了



大约一百年的殖民地所以有今天的繁荣，中国大陆面积这么大，如果要想繁荣起来一百年的殖民是不够的，要当三百年西方殖民地，才能走上正轨。刚才提到的那个副教授，他的言论是比较激烈的。除了要跟美国兵并肩作战的言论之外，他还说过朝鲜战争时，如果美军把志愿军打败而“直捣”北京的话，那么中国后来文革一类的灾难就都没有了。这些人的言论都是属于比较极端的，但是在“自由主义知识精英”中不无市场。

除了这些言论，在百姓中，在官员中崇洋媚外的思想越来越严重，并且肆无忌惮地表现出来，媒体有评论注意到，现在我们要创国产品牌，却要起一个听上去很像外国品牌的名字，实际上这个品牌跟外国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么做无非就是因为觉得洋名字好卖，大家认洋货、认洋名字。

缺乏民族自信和自尊的还有一个例子：我们中国人自己歧视自己的民族、歧视华人、歧视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语言。前两年在上海开一个全球华人物理学家的大会。会上规定发言不许用中文。这个规定非常奇怪：这是在中国土地上开会，而且是华人物理学家！明明是华人物理学家却不准用中文，这是对汉语莫大的歧视。我想肯定有很多人不同意这种做法，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不愿意成为“trouble-maker”（麻烦制造者）。结果只有丁肇中上去发言用中文，没有人敢去干涉。这也反映了中国一部分掌握权力的人的劣根性。如果你是一个中国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上去用中文发言，那肯定会遭制止。这些人既是一些没有民族自尊的人，同时又是一些非常势利的人。只要是外籍，只要是大牌，他全害怕，所以丁肇中上去讲他就没有办法。这种事情反映出在中国人中间，特别是在官员中崇洋媚外、缺乏民族自信心的

心态还是相当严重的。总的来说，现在民族主义在中国是太少而不是太多。我们提倡的民族主义是完全正当的，与所谓“自由主义”文人强加给它的罪名根本连不上。那些人喜欢用的一个例子是民族主义导致日本军国主义，导致纳粹的侵略、征服全世界的计划。这种联系是完全是没有根据的。

我刚才所讲的都是民族主义的衰弱在中国的一些表现。没有民族自信心，也就谈不上民族自强。因为所谓自强，就是要看到自己民族的缺点，只有自信才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我们民族的缺点是非常多的，而且非常严重。我想可能是因为中华民族太老了，所以有好多问题都是长年累积下来的，积重难返。民族主义者应当正确地对待这些缺点和问题。比如说鲁迅是对中华民族批判得最厉害的作者之一，但是他的出发点却是民族自强——你看中国人的这种德性，再不改可不行。要把伪民族主义从民族主义的阵营中清除出去。因为伪民族主义者打着维护民族的旗号做一些实则对民族不利的事情。我刚才讲了一个自信和自尊的问题，到了伪民族主义者那里他就会采取一个极端的立场——不允许自我批评。于是就成了鲁迅描绘的一种现象。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关于国粹的争论中，革新派要打倒孔家店跟传统决裂，所以要“批判国粹”。当时就有人出来维护国粹，而且是以民族主义的名义，说这是中华传统、国之精粹。鲁迅谈到这批国粹派就说，只要是祖宗的东西，便是宝贝，哪怕是烂疮，只要长在中国人的脸上，“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凡是中国的东西，再臭，哪怕是裹小脚的陋习，也是好的。这是一种伪民族主义，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真正的民族主义是自强，通过自我批判获得改造和新生。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你就要有相当强的竞争力，要能够跟别的民族竞争。如果有那么多陋习，肯定不行。诸如此类的伪民族主义，现在很常见，不用费很大劲，就能找到例子。

中国人现在富了，到国外旅游的人也多了。中国游客在国外的形象非常不好，随地吐痰的、大声喧哗的、不排队的等现象比比皆是。我记得在凤凰卫视上有过一次辩论。一方主张国民形象要好好改造，另一方不同意，说现在中国人出去，在好多国家都有用中文做的标识，比方说这要排队、这不能乱扔垃圾，专门写给中国人看。他们对此愤愤不平，说是对中国人的歧视。问题是人家一开始也不是故意要歧视中国人，而是根据经验，中国人到这很多不排队，所以说有必要提醒中国人。但是后面这拨人打着民族主义旗号争辩说，只要外国人说中国人不好，你们就说要改善，这就是崇洋媚外，是自我歧视。这不是什么行为上的不文明，文明不文明，要看拿谁的标准。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就喜欢热闹，我们聚一块，就喜欢大嗓门。国外的餐馆一般没有大声喧哗的，大家说话都是压低声音只让自己桌上的人能听见，不会影响到邻桌。不像我们的饭店，要是坐里面人多的时候，连自己桌上人说话都得使劲喊。他们就说，这不是不文明，这是习惯。这两边就在争论。

这是假借民族主义的名义在强词夺理。这个问题牵涉到文明的标准，这个跟普适价值的争论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文明有没有普适的标准。我想不管怎么样还是得承认是有的，只不过这个共同标准的起点你把它定在有多高。在公共场所高声喧哗，是中国人的习惯，外国人不能拿这个标准来约束中国人，那我再退一步问，那随地吐痰呢？中国不少人习惯随地吐痰，这是中国人的习惯

也不能管？那如果再退一步，随地大小便呢？

其实，把上述这些陋习说成是中国人的固有习惯才是对中国人的歧视。许多文明的行为准则，不管在哪个国家，对于哪个民族，都是伴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哪个民族或文明独占的东西。譬如不随地吐痰和便溺，随着人口在城市的高度集中，变成了一种公共卫生的需要，并成为文明的行为准则。这些行为在农村是无所谓的，尤其是在地广人稀的农村。有的时候下地干活，走出去十几里路，根本没有厕所，稍微跑远点避开人就解决了，不会造成任何后果，也没人嫌你不文明。在满地土疙瘩的大田里随地吐痰，你吐一口痰，再找都找不着。你大声说话也没关系，不影响别人。可是，问题是你进了城市以后，这么多人生活在一块，必然要有这些限制的要求。这不光是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的事，只要你走了现代化的道路，走了城市化的道路，就都会有这个要求。所以说，你说这个是民族特性就是强词夺理。

民族自尊和民族自强之间是个非常辩证的关系。一方面一个民族要自信自尊，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民族又要有批判自己、正视自己问题和缺点的勇气，要让自己的民族在不断的改造自新中变得更强更有朝气，更具竞争力，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最后一点就是民族利益至上。这一条我提出来可能有人会有疑问，因为好像这和中国人的道德观会有点冲突。按照中国人的伦理观民族利益至上好像与自私自利有点相通，而自私自利是不好的。所以我首先就要把你的心理障碍去掉。尽管我们的社会已经越来越变得唯利是图、道德沦丧，但是旧的传统的伦理观的影响还在，从道理上很多中



国人还是会觉得自私自利是不好的，至少利他要比利己高尚。大家都这么认为，你也会盲目接受。这是伦理观上的认识误区，其实利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顺应自然法则；反过来，利他则不然。

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地震的时候，你自己的孩子和邻居的孩子都压在废墟底下，如果其他条件都相同，那么你先挖谁的孩子？按照中国人模模糊糊还残留的伦理观，我应该先救别人的孩子，然后我再救自己的孩子，这样我就崇高了，但是，凭什么先挖别人的孩子就比挖自己的孩子高尚？当然，我说的是其他条件相同。如果说挖别人的孩子估计要5到10分钟，自己的孩子要挖好几个小时，那先花5分钟把别人的孩子挖出来，先解救一个，当然没问题。如果其他条件都相同，先救自己的孩子很自然，因为自己的孩子和你有血亲关系。但是反过来，先救别人的孩子，余震把自己的孩子压死了，你会受到心灵拷问，为什么没有先救自己的孩子？救了自己的孩子，再救别人的孩子，这样的顺序合乎自然，即使发生了力不从心的后果，你也会说我尽力了，不留遗憾。

我今天讲的民族主义有很多非常细的线要注意不能跨越。你不能只说，张老师说的要利己，所以我们以后可以不顾别人。利己要有利己的规范，比如损人利己就是有问题，唯利是图也是有问题的。在这个问题上，现实主义提出的“明智的利益、审慎的行为”原则应当是比较平衡、比较健全的行为准则，因为在“明智界定的自我利益”里就包含着对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尊重和兼顾。但是如果同样是利益，追求谁的利益为先？追求自己的利益为先。尤其是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更是这个样子。为

什么？因为一个国家的政府是被授权来领导、管理、组织这个国家的，未经授权没有这个资格和权力来牺牲你的民族利益或国家利益。你可以说我牺牲我个人，这是你个人的权利和伦理的选择。但如果要牺牲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任何人都没有这个权力。西方人虽然也提倡利他行为，而且社会上的利他行为也比中国多，但是他们不把利他放在否定利己或高于利己的伦理基础上提倡。西方有句谚语，就把这个顺序讲的很清楚，叫 *charity starts at home*（慈善从家里开始）。我觉得这句话对很多中国人是很有针对性的。不少中国人，自己家里的事、自己的孩子老婆不好好照顾，却到外头做好人。比方说，自己家本来就不富裕，让自己孩子饿着，把东西拿出来去给别家孩子吃，这种做法毫无道理。如果说你自己家里吃饱了，人家有困难，你把多余的东西拿出去帮助别人，这当然是值得发扬的善心。

讲到民族利益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树立本民族利益至上的观念。实际上，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把自己的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我们中国人总是觉得讲自己的利益好像是一件不太道德的事或者不太光彩的事，不太拿得上台面。我们的官方文告，提的是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或者中国与各国人民的利益相结合，却不单提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或者中华民族的利益。好像只有如此，我们的事业才显得特别崇高。这个事情如果放在外国，公众就会问，这个政府是谁的政府？是谁交税金养活的，又是为谁服务的？

我们的官员往往会搞不清或忘记谁是他的主人，他应该为谁服务，尤其在涉及到中国国民和外国人的关系上的时候，这些人往往把外国人放在中国人前面。这种例子举



不胜举。比如，某省的副省长有一次在电视上介绍他们招商引资的经验，他提出了“三个零”。第一，我们要跟外商保持“零距离”，第二，要做到外商的“零投诉”，第三，对外商投资的服务要做到“零收费”。这样招商，外资就来了。我要问，你是谁政府？你跟外商保持零距离，就说明你跟外商是穿一条裤子。如果外商保持零投诉，需要投诉的自然都是国人，因为在商业活动中肯定有利益的冲突，不可能做到人人满意。如果外商做到零投诉就表示他什么都满意，那不满意的倒霉蛋自然又是国人。如果说你政府保证做到这点的话，你把本省人民和本国企业的利益置于何地？你跟外商买办有什么不一样？这反映出我们的官员没有民族利益观念，更不用说民族利益至上了。

中国公民在中国经常受歧视，倒是外国人在中国可以享受种种优惠。结果“国民待遇”这个词在中国和在国外的含义是不同的。在国外，其他国家去的商人都竭尽全力地要争取那个国家的国民待遇，那是一种优待。但是在中国，国民待遇是二等的，外商的待遇是头等的，这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现象，

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民族没有向心力，没有凝聚力，因为我们自己都不把自己当回事，自己都不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国有一种变态的传统是对自己人不好，对外人好：“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所以，我们需要提倡民族主义，把这个民族团结起来，凝聚起来。

民族主义正常来说应该包括上述三方面的内容，可是我们现在做得都非常差，非常不到位。所以，需要为民族主义正名，需要让大家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而不是被“自由派”知识分子歪曲和污蔑的那个民族主义。这样的民族主义在中国是太少，而不是太多了。

**《新视界》：**您的访谈非常精彩，相信它一定会为同学们澄清民族主义的诸多疑问，启发大家深入思考民族主义对我国外交和内政的影响，并且使同学们了解到观察国际政治现实不能沉迷于表象，更不能人云亦云，要用自己的眼睛去审视真实的世界。再次感谢您对系刊的大力支持。



## 2010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观察

刁大明\*

11月2日，新一轮中期选战打响，作为奥巴马执政两年的“中期考试”而备受世人关注。在本次中期选举中，全部435位国会众议员和5位属地与特区代表、37位国会参议员、37个州和2个海外属地的州长以及州务卿等行政选任官员、46个州的州议会议员、多个城市的市政官员等都将面临改选。与此同时，移民政策等国家议题以及各州、各地方公共事务的政策议题，也将在中期选举中由选民投票决定。虽然中期选举几乎波及着美国从联邦到地方全部层次的政治事务，但从中美关系的观察视角出发，国会两院议员的换届改选当属我们关注与分析的重中之重。

### 国会选举结果的概况

共和党无疑是本次国会中期选举的最大赢家。目前看，在众议院中，共和党已斩获63席，最终将可以242比193一跃成为多数党。其中156位共和党人谋求连任，154位成功，连任率高达98.7%；民主党236位谋求连任，184人成功，连任率仅为77.9%，可谓惨败。值得注意的是，共和党仅有的两位连任失败者皆为亚裔，即路易斯安那州第2选区的越南裔高光映（Joseph Cao）和夏威夷州第1选区的华裔周永康（Charles Djou）。这一巧合或可理解为选举亚裔的选区在民意结构上仍旧具有强烈的民主党倾向。同时，在全部43个开放议席中，民主党只拿下7席，其他均被共和党人收入囊中。此外，4位民主党籍国会委员会主席连任受挫，其中包括位高权重的预算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两党均没有党团领袖竞选失手。

在参议院中，民主党涉险过关。在共和党人收获6席、增至47席的强势反弹之下，民主党勉强以53席维持尴尬的微弱多数。在全部14个开放席位中，共和党占据11个。同时，所有谋求连任的共和党人均如愿以偿，民主党阵营也仅有一人连任失败，即现任参议院农业、林业与食品委员会主席、阿肯色州民主党籍国会参议员布兰奇·林肯（Blanche Lincoln）。此外，民主党领袖哈里·里德（Harry Reid）出人意料地保住了席位，避免重蹈达施勒（Tom Dashle）的覆辙。

就选举地理而言，如表-1所示，众议院共和党人翻盘地区集中在山区、东南中、东北中、中大西洋以及西北中等地区，即洛基山区、“五大湖—中西部”的锈蚀带以及密西西比河沿岸从中西部到南部的内陆各州。表-2反映的参议院情况一定程度上与众议院的变化步调一致，唯独山区地带趋势不明。事实上，哈里·里德（Harry Reid）的意外胜利正发生在该地区的内华达州，而另一场重要选战即科罗拉多州也始终被预期将由共和党实现翻盘，最

\* 作者简介：刁大明，男，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博士后、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助理，2005、2007、2010年先后在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获得法学学士、法学硕士、管理学博士学位。



终在任者迈克尔·本内特（Michael Bennet）以 47.7% 比 46.8% 的微弱优势挽救了政治生命。从选情的地理分布看，本次中期选举是一次较为典型的“回摆”，一方面传统共和党区域从温和民主党手中回归原教旨色彩的基本盘，另一方面所谓的摇摆地区再次剧烈摇摆起来，其向度正好与 2008 年相逆。换言之，本次国会中期选举中共和党人虽然实现了 1946 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院会翻盘，但至少从两党政治的基本面上看，远非是一次重新划分政治疆域的重组式选举。

表-1 共和党众议院议席翻盘的地区分布

	共和党翻盘	本地区总席位	比重
总数	63	435	0.144828
新英格兰	2	22	0.090909
中大西洋	11	61	<b>0.180328</b>
西北中	5	31	<b>0.16129</b>
东北中	14	69	<b>0.202899</b>
南大西洋	12	80	0.15
东南中	6	26	<b>0.230769</b>
西南中	5	48	0.104167
山区	7	28	<b>0.25</b>
太平洋	1	70	0.014286

表-2 共和党参议院翻盘的各州

	2008		2004	
	奥巴马	麦凯恩	克里	小布什
伊利诺伊	<b>61.9%</b>	36.8%	<b>54.8%</b>	44.5%
宾夕法尼亚	<b>54.7%</b>	44.4%	<b>50.9%</b>	48.4%
威斯康星	<b>56.2%</b>	42.3%	<b>49.7%</b>	49.3%
印第安纳	<b>49.9%</b>	48.9%	39.3%	<b>49.9%</b>
阿肯色	38.9%	<b>58.7%</b>	44.6%	<b>54.3%</b>
北达科他	44.6%	<b>53.3%</b>	35.5%	<b>62.9%</b>

### 民主党国会失利的主要原因

纵观美国国会与选举政治的发展历史，中期选举作为国家大政方针的例行“刹车检修”，本就不利于掌握白宫的“总统党”。两年前，将一党候选人送入白宫的选民们，往往会开始挑剔其执政绩效，转而投票给另一政党，形成所谓的“钟摆效应”。前两次在中期选举后的国会政党轮替发生在 1994 年和 2006 年。前者是共和党人抓住克林顿医改等政策失败的机会，凭借《与美国缔约》的政策议程而夺取国会多数；后者则是民主党人在小布什伊拉克政策大失民心的背景下，重掌参众两院。与这两次关键选举比较而言，本次中期选举中民主党的惨败突出体现为三方面的原因，值得关注。

其一，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根据盖勒普民意调查机构在 10 月 21 日至 24 日期间所做民调显示，43% 的选民关心“经济状况”议题；CNN 在选举前夜公布民调也显示有 52% 的选民将以经济议题作为投票的指针。在过去两年中，奥巴马政府的确较为成



功地推动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以扩大政府支出规模等方式尝试整顿金融业、挽救传统制造业，谋求扩大就业，推进经济复苏。然而，当步入 2010 年 10 个月后，美国社会仍旧承受着失业率将近 10% 的沉重压力。当选民们对经济失望时，便转向了共和党人为刺激就业开出的“药方”。共和党人也抓准时机，效仿 1994 年的做法抛出《向美国承诺》的政治纲领，将“重振经济、创造就业”置于第一要务，成功吸引了选民。这一趋势正好符合了前文中的判断，即共和党翻盘的主要地区集中在中西部五大湖地区以及南部密西西比河沿岸各州。这些地区恰是传统产业密集地带，失业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选民对经济状况反应更为敏感，因而用自己手中的选票表达了强烈的失望情绪，成为民主党失败的主因。

其二，医改等政策激起民怨。奥巴马上台后，凭借民主党同时执掌国会两院这一难得宪政优势，强力推进了一系列自由派政策，最具代表的正是全民医疗改革立法。这一立法是在本党温和保守派、共和党人以及中间选民温和派的强烈抵制下强行完成的，民意基础不牢，激怒了美国社会中的保守派和温和派势力，甚至酿成了一场反对“大政府”、反对“多支出”、反对“政治现状”、反对“在任者”的草根参政，即“茶党”运动。本次众议院选举中，民主党温和保守派即“蓝狗连线”成员全部 54 人就有 28 人落选。这些“蓝狗连线”原本多数来自广大的南部保守地区，从选情结果看，这些地区也是共和党增长席位的主要票源。由此可见，选民意愿出现右倾，转而选择了更为保守的共和党人，再度解释了南部成为共和党主要翻盘地区之一的现实情况。

其三，奥巴马“变革”魅力失效。2008 年，奥氏历史性的当选具有两个大背景：一是选民对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的不满，二是美国处于金融危机的阴影之下。奥巴马正是看准谋变的民意抛出了“变革魔咒”，捕获了中间选民和年轻人的支持。这一战略在山区八州收效最为明显，甚至连一向传统保守的蒙大拿州也在大选之夜差点转投奥巴马。现在看，中间选民转而导向了共和党人。民意机构 PEW 在 10 月底的一份民调指出，仅有 37% 的中间选民支持奥巴马连任，低于同期同机构民调中其 47% 的普通民众支持率。面对中间选民的倒戈和共和党人带来的新“变革”，奥巴马必须在未来两年中以政治智慧和政策绩效做出回应。这一特点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共和党在洛基山区地区的翻盘。近年来，该地区八州正在经历西海岸 IT 等产业以及从业者的迁入以及大量新移民的涌入，处于选民结构的变革期，中间选民和年轻选民成为该地区政治风向的主宰者。

### 极化国会与分立政府

2011 年 1 月 3 日即将开幕的第 112 届国会，将由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和民主党执掌的参议院构成，并与奥巴马主导的白宫形成所谓的“分立政府”，陷入府会的党争对峙局面。共和党可从占据多数的众议院发起并顺利通过立法，但在参议院中将遭遇民主党人的强烈抵制；民主党人则只能在其控制的参议院中尝试通过立法，但因无法达到终止冗长发言的 60 席，而将很难确保立法在参议院的通过，即便通过，也将在众议院搁浅。在如此相互制肘的





情况下，分治两院的两党必须采取合作，才可能达成有效立法。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事实上从 2006 年民主党获得中期选举胜利，进而时隔 12 载重返国会众议院多数后，虽然民主党党团由党内自由派主导，但佩洛西等人仍旧需要借助规模可观的温和保守派即“蓝狗”民主党维持多数，甚至医改等众多议题最终的攻坚也是在这些坚持“有限政府”、“有限支出”以及“现收现支”的党内异议者身上。如今，民主党搭起的“大帐篷”被撕裂，温和保守的民主党人被彻底保守的共和党人取代，民主党内更多连任的是自由派人士，这就意味着民主党党团或将回归基本意识形态。而共和党一边，很可能由于保守派新议员的加入而出现更为极端的倾向，因而国会内至少在众议院内的两党将很可能更为水火不容，更为极化，难以达成共识、展开立法合作，反而政党恶斗在所难免。

在国会两院党争的同时，未来两年的府会分立也会使奥巴马沦为“跛脚鸭”。事实上，在过去 30 年的 15 届国会中仅有 5 届不是分立政府，最近的一次正是现在所处的会期（2009-2010），可谓是奥巴马大展宏图的“机会之窗”。但在新国会开幕之后，奥巴马将彻底丢失这一机会，可选择的政策菜单将受到极大限制，此前高调倡导的“新能源产业”、“无核世界”等都可能因与共和党政治立场相去甚远而无法兑现。对“跛了脚”的奥巴马而言，两位前辈的攻略或将具有指导意义。其一，是里根。这位明星总统至今仍旧被共和党人念念不忘，谈起某个新星时也会冠之以“里根式的”或“如何如何的新里根”之名。其实，里根任期的八年，府会关系始终分裂，特别是第 99 届国会期间的“弱分立”，与未来的第 112 届国会中两党在两院对峙的局面极为相似。里根采取的方式即强力推进既定政策，即便将会遭遇民主党国会的抵制甚至否决也在所不惜，其结果可能是很难实现其偏好的政策，但可以将失败的责任推脱到对手的阻挠上，赢得选民的同情与理解。根据统计，里根八年中，共采取了 78 次否决行动，其中 39 次是搁置否决，如此数字即可管窥府会冲突之大。其二，则是克林顿。这位至今仍旧活跃在美国政坛、在本次选举中四处站台背书的国务卿丈夫在任期的后六年面对的是一个全部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两院，即“强分立政府”。1994 年，《与美国缔约》的共和党重返国会多数后，克林顿尝试放弃了部分政策议程，转而在某些议题上谋求与共和党国会妥协，以换取后者在另一些议题上的支持，其结果是部分实现政治目标，但可能失去本党某些极端基本盘的拥趸。相比于里根的高否决，克林顿仅施用 37 次否决，且仅有一次搁置否决，也可验证其与国会合作成效。无论如何，是否能将“巧实力”用于应对国会，从而有效推进既定政策，将直接关乎奥巴马 2012 年的连任之旅。

根据国会内共和党阵营选区前后的宣传与表态判断，新国会开启后两党将马上陷入关于财政议题的争辩当中。首先，时至今日，2011 财政年度的全部 12 项拨款法案均尚未获得两院任何一个院会通过。2011 财年已于 10 月 1 日开始，为了维持联邦政府运转与政策项目运行，两院批准了一项延续拨款法案，有效期截止到 12 月 5 日，而在第 111 届国会余下的不足 7 周的会期内很难通过所有拨款法案。这就意味着，在新国会开启之后，拨款立法将马上摆在奥巴马和共和党众议院面前，刚好为共和党人履行《向美国承诺》、以削减自主性拨款



数额等方式，纠正奥巴马政策创造了绝佳良机。更为关键的是，奥巴马全民医改计划的众多部分虽为强制性授权项目，但也必须作为拨款法案的组成部分得到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批准后方可实施。其二，小布什在 2001 年和 2003 年分别主导的涉及 1.35 万亿美元的两项减税法案将于 2010 年底失去效力，共和党人很可能主导众议院延续这一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计划，削减政府收入，在满足选民要求的同时，使奥巴马政府无钱可花、无事能做。其三，正如将出任新一届国会众议院议长的博纳所言，共和党众议院将践行包括“尽力废除医改立法”在内的政策承诺。其中很多主张客观讲立法难度极大，能否兑现承诺，而不重蹈 1994 年共和党《与美国缔约》“自食其言”的窘况，的确还是未知数。

### 中美关系或因中期选举再现波折

目前看，共和党主导众议院之后，奥巴马政府推行政策将受到很大制肘，对美国内政外交都将可能产生较为复杂的影响，这种影响也一定会在中美关系这一对两国而言都极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上有所体现。

与 2006 年中期选举和 2008 年总统大选不同，本次中期选举再次开始大肆炒作中国议题。正如《纽约时报》10 月 9 日的报道那样，按照当时统计，角逐中期选举的两党候选人中至少有 29 位候选人（19 位民主党、10 位共和党）公开投放了炒作中国议题、攻击中国的竞选广告，其中不乏里德这样的国会领袖。而中国议题甚嚣尘上的背后，最为直接的解释就是本次中期选举以经济议题当家。面对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不断崛起的经济实力，美国政治人物自然而然地将经济困境归咎于中国，向中国施压，并以此动员、煽动选民。《纽约时报》报道中提及的 29 位议员或州长候选人主要集中在摇摆州，也足以说明议员操作中国议题的投机性动机。可以预见，即便是共和党主导国会众议院之后，只要经济问题仍旧困扰美国社会，中国议题就不会在短时间内冷却，甚至有成为常在操作议题的可能。

首先，共和党国会可能更以此制造消极涉华提案。从历史经验上看，共和党主导国会比民主党主导国会在对华议题上明显更具敌意。根据对 1979 至 2006 年国会两院涉华提案的统计归类发现，两党在经贸议题上保持同等而较高的关注度的同时，共和党在安全、人权以及台湾议题上的介入明显超过民主党。共和党议员提出的关于安全、人权和台湾议题的涉华提案数量分别是民主党议员的约 130%、140% 以及 200%。这就意味着，共和党主导国会众议院的情况下，安全、人权以及台湾议题将可能再度上升为中美双方交锋的热点，与经贸、人民币汇率等合流困扰中美关系发展。

第二，中期选举导致国会内涉华连线构成剧烈变化。美国国会内长期存在着某些涉华组织，2002 年以来众议院更是相继成立了台湾连线、美中工作小组、中国连线、西藏连线等议员非正式连线组织（caucus）。这些连线都以美国利益出发，但所持对华态度大相径庭，其中美中工作小组对华态度较为正面，积极致力于推进中美在经贸、军事、科技、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而台湾连线、中国连线以及西藏连线则分别在台湾问题（台独）、中



国在经济与军事上的崛起威胁以及涉藏议题（藏独）上对华持有消极态度。根据统计，第 112 届国会众议院将迎来 92 位议员，属于规模较大的议员更新。这一人事更新也直接影响到各连线的变化情况，如表-3 所示。具体而言，台湾连线的更新率与整体水平持平，说明基本能保持目前规模，保存了继续炒作涉台议题的能量。而西藏连线，本就规模极小，发展态势不佳，本次选举出现 25% 的更新，可能在下届国会中消失。相比之下，规模适中的美中工作小组和中国连线变动略大，应该注意区别对待：一方面可否考虑与美中小组建立持续有效联系，效仿众多国家和地区游说美国国会的做法，增强美中小组的规模和实力；另一方面适当与中国连线保持一定联系，促使这些对中国感兴趣的议员了解真实中国。

表-3 国会众议院各涉华连线选后人员规模变化

	台湾连线	美中工作小组	中国连线	西藏连线	全部众议院
第 111 届国会中成员数	155	39	33	8	435
离开议员数	30	9	10	2	92
更新率	19.4%	23.1%	30.3%	25%	21.1%

第三，中期选举导致国会内重要涉华人物沉浮。在就新国会对中美关系影响的大趋势充分考虑的同时，还有必要关注本次中期选举特别是选举后，国会山上的某些对中美关系可能发挥关键作用的政治人物的去留变化。毕竟从中美关系的历史上看，操弄中国议题者往往屈指可数，但其带来的恶劣影响却无法估量。这里先列举 4 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加以观察：

#### 1. 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

现任纽约州国会参议员，民主党人，2010 年谋求第三个任期，毫无悬念地连任。在第 111 届国会参议院中，舒默是多数党党团副主席、党团第三号人物，仅次于多数党领袖兼党团主席的里德和党鞭杜尔宾（Richard Durbin）。在党内，舒默以极高的募款能力著称，其背后代表着众多金融投资业财团的利益。2003 年，正是舒默一手挑起了人民币汇率议题，其可谓是该议题的始作俑者，该议题的炒作也使舒默本人积累了强大的政治资本与影响力。由于里德的再次当选，舒默将基本无法竞争领袖，这就意味着，他存在继续炒作人民币汇率议题的动机，并且这也恰好是与共和党国会最好的党争工具之一。

#### 2. 伊琳娜·鲁斯-莱蒂南（Ileana Ros-Lehtinen）

现任佛罗里达州国会众议院第 18 选区众议员，共和党人，1989 年当选，是第一位当选国会议员的古巴裔美国人，也是第一位当选国会议员的拉美裔女性。鲁斯-莱蒂南对国际事务极为关心，具有较强的保守意识形态，对中国持有较大偏见，多次在院会内提出涉及中国人权、台湾、西藏、奥运会等议题的消极立场提案，攻击中国，同时她还是“台湾连线”的积极参与者。在第 111 届国会中，鲁斯-莱蒂南担任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成员（ranking member），是该委员会内共和党人的领袖。一旦共和党掌握第 112 届国会的多数席位，鲁斯-莱蒂南将顺理成章地从“首席成员”转为“主席”，彻底接管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审议大权。在这种情况下，其主导外交事务委员会审议、通过更多消极涉华议题的可能性增大，



值得特别注意。

### 3. 史蒂芬·夏伯特 (Steve Chabot)

前任俄亥俄州国会众议院第 1 选区众议员，共和党人，1995 年当选，2008 年以 48% 比 52% 败北，2010 年卷土重来，以 52.4% 比 45.1% 再次当选。夏伯特直接参与、推动了台湾连线的组建，并自任该连线联席主席之一，其对中国态度一贯强硬，坚决支持“台独”。根据统计，2001 年至 2006 年的 7 年间，国会两院共产生 47 件直接涉台提案，其中 7 件就出自夏伯特之手。此人一旦重返国会山，会否“重操旧业”，继续经营“台湾连线”，操作台湾议题，值得我们提防。

### 4. 马克·柯克 (Mark Kirk)

现任伊利诺伊州国会众议院第 10 选区众议员，共和党人，2001 年当选。2010 年中期选举中，放弃谋求国会众议员连任，转而竞争国会参议员成功。因其竞争议席原为奥巴马就任总统前所在议席而引起全美媒体关注。因其选区与摩托罗拉和麦当劳等在华经贸利益深厚的企业关系密切，柯克本人对华态度理性、积极。2005 年，柯克与华盛顿州的民主党国会众议员里克·拉森 (Rick Larsen) 一道建立了美中工作小组，致力于推进中美两国在经贸、文化以及军事等多层面的交流与沟通。柯克当选国会参议员后，极有可能将成为国会参议院内有助于中美两国关系顺利发展的一个积极因素。但同样有必要留意的是，美中工作小组网页原本与柯克的议员官方网页链接，但自其宣布竞选国会参议员之后，该链接便被删除。这一细节或可说明，中国议题在选举政治中的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值得思考。



## 权力、认同与中国的国际地位

### ——评《中国寻求国际地位：国际关系的重新调整》

常璐璐\*

**内容提要：**在中国实力上升的背景下，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的身份定位和基本目标。在《中国寻求国际地位：国际关系的重新调整》一书中，邓勇引入社会学意义上的“地位”概念，对中国崛起过程中的权力与身份问题进行了富有创新性的解读。本文试图对作者在书中阐述的核心逻辑加以梳理，尤其是对其综合现实主义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的努力加以评析，在此基础上评论这项研究的成就与缺陷，以期对理解中国崛起道路和中国外交政策提供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借鉴。

**关键词：**地位 权力 认同 中国外交政策

中国正在崛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中国以何种方式崛起、如何定位自身、将对国际秩序产生何种影响等问题在国际关系学界却充满争议。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崛起及其意义，邓勇在《中国寻求国际地位：国际关系的重新调整》一书中创新性地引入社会学中的“地位”概念，在批判国际关系理论对大国崛起的传统观念的基础之上，将现实主义理论的“权力”概念与社会认同理论的“认同”概念加以整合，通过分析中国的双边、多边外交实践来探讨中国如何寻求自身的国际地位，为理解中国在崛起过程中的道路选择和外交政策提供新的分析视角。本书不仅客观详实地展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而且挑战了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对大国崛起、权力转移的固有观念，更有助于国际社会真实地了解中国崛起的方式和意图。

###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外学术界高度关注“中国崛起”这一议题，在中国的实力地位、国际意图、对国际体系的影响以及美国的对策等方面产生了众多研究成果。<sup>①</sup>然而，在中国以何种方式崛起、对自身如何定位这样的关键问题上，现有的研究并没有形成具有说服力的结论。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现存国际秩序的稳定、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重新定位以及主要大国的对华战略等重大问题。大国崛起道路无外乎战争与和平两种，德国、日本是武力扩张以挑战现存霸权和国际秩序的代表，而美国则是通过和平过渡，成功崛起为世界霸主的代表。历史上的大国崛起对中国现今崛起道路的选择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崛起道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和平崛起”概念的学理内涵、“和平崛起”道路的合理性与

\* 作者简介：常璐璐，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 2009 级硕士研究生。

① 林民旺：《单极世界下的中国崛起——读〈中国大战略与国际安全〉》，《中国图书评论》2009 年第 12 期，第 76-78 页。



必然性的分析等方面。这些研究通过否定“霸权周期论”、“权力转移”理论等，从国际关系的其他理论中为中国“和平崛起”寻找理论注脚，比如秦亚青从国际制度和经济相互依存的角度解释“和平崛起”的现实性与可能性。<sup>①</sup>在外交实践中，从国家领导人到各级政府官员，都在向国际社会阐述中国“和平崛起”的理念，用“和平崛起”来描述中国未来的形象，将“和平崛起”作为自身的角色定位，并将这种理念贯穿于对外关系的开展之中，以期为中国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除了国内学者对中国崛起道路的讨论以外，国外学者对中国崛起道路的研究也非常丰富。在新近出版的相关著作中，季北慈（Bates Gill）的《崛起之星：中国的新安全外交》研究了冷战后中国的“新安全外交”以及国际社会的反应；<sup>②</sup>谢淑丽（Susan L. Shirk）的《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则建议美国决策者客观地看待崛起中的中国，不要夸大中国的经济增长，因为中国大量严重的国内问题使其崛起之路遭遇困境；<sup>③</sup>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的《社会化的国家：国际制度里的中国，1980-2000》试图用“社会化”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和平崛起”，探讨中国日益广泛地参与国际机制、成为“负责任大国”的动因；<sup>④</sup>金俊远（Avery Goldstein）的《中国大战略与国际安全》勾勒了在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下中国应采取的大战略。<sup>⑤</sup>

对于中国崛起的道路问题，邓勇的《中国寻求国际地位：国际关系的重新调整》引入了“地位”这一概念，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进行解读。该书提出的研究问题是：中国在崛起中如何寻求自身的国际地位？中国当前的外交困境是什么，应该如何化解？中国开展外交关系的动力和方式有哪些？下文将通过比较现实主义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对作者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上述问题的分析和解答加以评析。

## 二、大国寻求国际地位的方式——权力与认同的博弈

在对大国寻求国际地位的方式的解释中，现实主义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最具代表性，同时它们又采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路径，该书则试图取两种理论之精华，对现实主义的“权力”概念和社会认同的“认同”概念加以整合，提出自己的理论架构，以此作为中国寻求国际地位时应采取的方式和原则。

### （一）现实主义对大国寻求国际地位的解释

- 
- ① 阎学通、秦亚青等：《“大国崛起与中国的选择”笔谈》，《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② Bates Gill, *Rising Star: China's New Security Diplomacy* (New York: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7).  
③ Susan L.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④ Alastair Iain Johnston,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⑤ Avery Goldstein,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对于新兴大国如何崛起,是否会变革现有秩序,是否会导致大国之间战争的出现,现实主义理论中的“霸权现实主义”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最具代表性。<sup>①</sup>霸权现实主义又可以分为权力转移理论和霸权更替理论。A.F.K·奥根斯基(A.F.K. Ogansky)是权力转移理论的代表,他在1958年出版的《世界政治》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想。奥根斯基的基本观点是,崛起国常常想打破现有国际秩序,是“不满意的国家”,而主导国想要维持现有秩序,是“满意的国家”,“当不满意的国家认为有机会通过战争赢得秩序主导权的时候,它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通过战争来改变现状”,<sup>②</sup>因此权力转移需要通过大国战争的方式实现。霸权更替理论以罗伯特·吉尔平为代表,这一理论认为一国随着自身实力的增长,将通过领土、政治和经济扩张的方法来谋求国际体系的变革,直到变革的边际成本等于或大于边际收益时为止。“根据报酬递减规律,当国家进入成熟期之后,根据国家规模及其对国际体系控制范围的扩大,其控制收益递减,成本递增,必然导致霸权的衰落。”<sup>③</sup>体系中衰落国家和新兴国家的不同增长率导致了决定性的权力再分配以及体系的不平衡,解决这种现象的“主要手段是战争,尤其是我们所称的霸权战争”,“霸权战争是对现存体系中大国相对地位转变的最终测定”。<sup>④</sup>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在国际体系中既有的霸权国同后起的新兴大国间,以争夺权力为特征的霸权战争不可避免。”<sup>⑤</sup>

## (二) 社会认同理论对大国寻求国际地位的解释

由于“地位”、“认同”的研究最早开始于社会学和心理学,所以“社会认同理论”从个人、团体层面为国际地位这一议题提供了最初的社会学解释,之后这些理论逐渐被国际关系所吸纳运用。

社会认同理论由泰弗尔(Henri Tajfel)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他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认识到他(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sup>⑥</sup>社会认同理论的主要观点认为,“个体通过社会分类,对自己的群体产生认同,并产生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sup>⑦</sup>而低地位群体通过群体关系来维持和提高社会认同,采

①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吉尔平和罗伯特·基欧汉的“霸权稳定论”、莫德尔斯基的“和平周期论”统称“霸权性现实主义”,区别与“均势理论现实主义”。参见朱峰:《“权力转移”理论:霸权性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3期,第31页。

②A.F.K.Ogansky, *World Politics*, 2<sup>nd</sup>ed, New York: Alfred A.Knopf, 1958, p.123.转引自朱峰:《“权力转移”理论:霸权性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3期,第26页。

③门洪华:《权力转移、问题转移与范式转移——关于霸权解释模式的探索》,《美国研究》2005年第3期,第29页。

④ [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杜建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0页。

⑤ 封永平:《认同变迁:英美权力的和平转移》,《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3期,第21页。

⑥ Henri Tajfel,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87), Chapter1-3.转引自张莹瑞:《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心理科学进展》2006年第1期,第476页。

⑦ 张莹瑞:《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第476页。



采用的策略有三种：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社会竞争（social competition）、社会创造（social creativity）。采取三种不同方式的依据在于，群体边界是否具有可通透性和群体间地位现状是否合理、稳定（见表-1）。当群体边界具有可通透性，低地位群体的成员就会加入高地位群体以获得更满意的社会认同，这种流动不改变群体之间的地位现状。当群体之间的边界固定、不可通透时，低地位群体的成员可以采取两种方式进入高地位群体：其一，当群体间关系被认为是合理、稳定的时候，低地位群体成员采取“社会创造”的方式，即选择其他的比较维度、重新评估现有比较维度的价值、与地位相同或地位更低的群体进行再比较，这种方式在不改变群体间现状的前提下，突出低地位群体的价值；其二，当群体间关系被认为是不合理或不稳定时，低地位群体可以通过“社会竞争”的方式寻求与高地位群体相等或更高的地位，这样群体间将产生激烈的冲突。<sup>①</sup>

表-1 低地位群体维持和提高社会认同的策略

	社会流动	社会创造	社会竞争
群体边界是否可通透	是	否	否
群体间地位现状是否合理、稳定	是	是	否

(三) 该书对中国寻求国际地位的解释

为了将社会认同理论应用到国际关系领域，邓勇首先重新界定了“地位”的概念。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地位”（status）的经典定义是：“一种在社会评价中典型有效地要求的特权化，或受特权损害，它建立在下述事实之上：a) 生活方式；——因此也建立在b) 正式的教育方式；即：1) 经验的训练；或者2) 合理的教育，并且具有相应的生活形式；c) 出身威望或职业威望。”<sup>②</sup>之后的社会学对“地位”的认识都沿用韦伯的上述定义。社会学的“地位”包含职业、教育、种族、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等，其“地位”概念从物质中分离出来。然而，国际关系学中的“地位”概念则与社会学的概念有很大的差别。现实主义理论对“地位”及其类似概念多有论述。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取决于国家间物质力量的分配，“国家根据权力大小而占据不同的位置”。<sup>③</sup>“现实主义将国家对地位的寻求等同于国家在权力的等级秩序中争取更高的位置。”<sup>④</sup>

邓勇认为，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社会认同理论对地位的解释都不够全面，社会学把“地

①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Alexei Shevchenko, “Status Seeke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4, Spring 2010, pp. 68-75.

②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出版社1997年版，第337-338页。

③ [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3页。

④ Yong Deng, *China's Struggle for Status: the Realign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





位”概念从物质因素中分离出来，忽视了权力因素在追求地位过程中的作用，而国际关系学中的现实主义理论将地位等同于权力，认为地位的寻求是一种零和游戏。作者在书中所采用的“地位”概念是对社会学和国际关系理论“地位”概念的综合，即“地位指国家对其物质利益和国际境遇的同时关注，并以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增长为目标”。<sup>①</sup>“没有权力就没有国际认可，然而，没有国际认可的权力会增加他国对中国的恐惧”，<sup>②</sup>这正是作者将国际关系的物质“权力”和社会学的精神“认同”同时糅合在“地位”概念中的用意所在。

基于社会认同理论，作者认为中国当前外交政策的困境在于中西方之间的认同差异。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社会认同是在社会分类(social categorization)、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和积极区分(positive distinctiveness)等原则之上建立的。社会分类指“人们会自动地将事物分门别类，因此在将他人分类时，会自动地分为内群体和外群体”<sup>③</sup>，并将两者的区别最大化。群体间通过积极区分原则进行社会比较，使个体寻求积极的自我评价的需求得到满足。在国际关系的现实中，美国及其盟友将自己视为“内群体”，而将中国这个崛起的大国视为“外群体”。西方通过市场经济、自由民主来构建其“内群体”的认同，将经济威胁、共产党国家、不确定性这些特点作为中国的“外群体”特点。在进行社会比较时，将西方与中国明显地区分为“自我”与“他者”，将进一步强化的“内群体”特征赋予自我，拉大“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差异，这样就导致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敌意和两者之间的冲突。正是西方对中国的这种恐惧和不信任导致中国在寻求自身地位的过程中遭遇阻力，这在“中国人权问题”及“中国威胁论”等议题上可见一斑。

那么，针对这种现实，中国应该采取何种方式更好地寻求自身的国际地位呢？作者运用经济学家阿尔伯特·O·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的“退出”和“呼吁”两个概念来说明，<sup>④</sup>个体对于现存秩序，可以选择接受高地位群体的特征，或者改变社会比较的标准两种方式。“退出”与“呼吁”是“破”与“立”的结合，对于中国来说，首先，要从国际体系的“边缘”“退出”，进入其核心地带，但这一过程并没有结束，中国还要进行“呼吁”，即发出自己的声音、寻求自己的位置。因此，作者认为，“判断中国对大国地位的寻求，我们必须认识到国际关系中权力政治逻辑依然存在的事实，中国对现存国际安排所采用的对策将是顺应与修正的混合产物。”<sup>⑤</sup>所以本书中的“地位”应是权力与认同共同作用的结果，即地位=权力\*认同。权力对于一国寻求国际地位的作用固然重要，“对权力的关注不是修正主义国家的标志”，<sup>⑥</sup>中国的经济、军事力量的强大是是中国寻求大国地位的前提条件，但中国

① Yong Deng, *China's Struggle for Status: the Realign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2.

② Yong Deng, *China's Struggle for Status: the Realign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21.

③ 张莹瑞：《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第476页。

④ [美]阿尔伯特·O·赫希曼：《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卢昌崇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⑤ Yong Deng, *China's Struggle for Status: the Realign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39.

⑥ Jeffrey W. Legro, *Rethinking the World: Great Power Strategie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74.



的对外政策不会像现实主义所认为的那样，通过权力竞争、以大国战争的方式实现地位的取得。相反，中国在物质力量增长的同时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国际地位的合法性认同；在被大国、邻国接纳的前提下发挥自己的力量；中国不是要打破、颠覆现有秩序，而是要参与、改进现有秩序；中国是国际秩序的参与者而不是挑战者。

最后，作者通过中国外交实践来进一步证明自己的上述观点。中国积极地应对人权问题和“中国威胁论”。中国与俄罗斯、印度、东盟保持“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日本是“相互依存的竞争对手”。中国通过东北亚的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东南亚的“东盟”、中亚的“上海合作组织”、非洲的中非合作论坛开展多边外交实践。中国对台政策更加宽松，两岸交流也更加紧密，但台湾问题的复杂性，使其仍将对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形成严峻的挑战。<sup>①</sup>这些具体的外交案例表明，中国并没有在崛起中打破当今的世界格局，反而试图通过各种双边、多边外交来融入现有秩序。当然，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在维持现有秩序的前提下，又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是中国外交政策所践行的原则。

在理论与现实分析的基础上，作者也试图探寻中国崛起对现代国际关系的启示。作者认为，在国内层面，中国在实力增长的同时需要寻求这样一种国际认可，即中国是合作的、建设性的力量，而不是革命的、威胁性的力量；在地区层面，中国会适时调整它在地区的身份和利益，实现中国崛起与地区秩序的良性互动；在国际层面，我们需要改变传统现实主义的大国崛起观念，大国战争不是一国崛起的必经之路，国际关系将会呈现多元化、全球化。<sup>②</sup>

### 三、该书的不足：理论与案例的脱节

《中国寻求国际地位》一书共有九章，除了第一章内容简介、第二章理论架构、最后一章观点总结以后，其余章节全部为案例研究，包括中国的双边、多边外交实践，中国对人权问题、“中国威胁论”的应对以及对台湾问题的政策等。虽然作者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分析非常详实全面，但是作者对理论的阐释和把握却存在明显缺失，也没有将其理论很好地运用到案例——中国对外政策——的分析中去，因此难免出现理论与案例脱节的情况。

作者在书中提出的理论架构试图将现实主义理论与社会认同理论进行融合，那么，“权力”和“认同”便成为此书的两个核心概念。“权力”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经典术语，在本书中没有什么争议，作者也是沿用这一概念。但是，对“认同”这一概念的使用，作者在本书中却存在很大的混乱，分别使用了认同(identity)、认可(recognition)和合法性(legitimacy)等三个概念，其中“认可”的使用频率较高。三个术语有一定程度的相似含义，但仍然存在明显差别。认同在社会学中用来描述个人对他们的个性和团体之间联系的感知和表达。<sup>③</sup>

① Yong Deng, *China's Struggle for Status: the Realign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269.

② Yong Deng, *China's Struggle for Status: the Realign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278, 288, 294.

③ [http://en.wikipedia.org/wiki/Identity\\_\(social-science\)](http://en.wikipedia.org/wiki/Identity_(social-science)) (最后访问时间：2010年7月20日)。



可在社会学中是指对一个人的地位和长处的共同承认。<sup>①</sup>而合法性最早源于法学，在政治学中是指把一种管理机制和法律视为权威的普遍接受。<sup>②</sup>由此定义可以看出，三个概念有不同的来源，在不同的学科中有不同的含义，而作者没有将所运用的概念进行明确界定、严格区分，因此书中对三者进行互换是不妥的。

概念的界定和厘清是理论架构的第一步。接下来，作者需要对本书的理论进行阐释，并且展示其内在机理，但是作者在这一方面也是浅尝辄止。作者也提出，本书写作的目的不在于理论的构建，而是试图解释中国外交行为的动力和方式。<sup>③</sup>尽管该书的主旨并不是建构新的理论，但对既有理论的整合运用也需要将其内在逻辑及内涵进行明确的表述，而作者只是提到了其中的一些术语和观点，缺乏明晰的理论框架。另外，作者在书中也涉及到了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理论，但“没有解释这些分析视角与现实主义的区别和联系”，<sup>④</sup>因此将其理论运用于对中国寻求国际地位这一核心问题的解释时，理论分析就显得较为单薄。作者并没有明确指出各种理论在自己研究此问题中的优缺点，没有明确指出本文运用哪些理论，这些理论的核心观点又是什么。总体而言，本书“需要对中国追求国际地位的外交政策和实际行为有更多系统、综合的理论评述”。<sup>⑤</sup>

除了理论架构方面的缺失之外，在作者的写作安排中，理论与案例之间也存在明显的鸿沟。在该书的开篇部分，作者提出了所要运用的理论，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该书行将结束时，作者集中展现了中国外交的具体案例，然而作者既没有将这些理论运用到案例的分析中，也没有用这些案例来证明自己的理论，只是停留在对案例事实的描述阶段。直到本书的结尾部分，作者才又重拾理论，而中间的案例似乎与该书前前提到的理论关系不是很密切。

这种写作方法不仅没有将理论解释清楚，也没有将理论与案例有机地整合。相比而言，同样是研究中国和平崛起这一议题的江忆恩，在他的著作《社会化的国家：国际制度里的中国，1980-2000》一书中则很好地处理了这个问题。《社会化的国家》从“社会化”这一视角出发，以理论的构建和阐释为主线，采取综述——分述——总结的写法来研究中国为何在国际安全机制里采取合作行为。<sup>⑥</sup>第一章作者提出问题，并综述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社会化”这一观点，在接下来的三章中分别论述“社会化”中“学习”过程的三个组成部分：模仿、社会影响、说服，而在每一章的理论阐述之后，都有相应的案例来支撑自己的观点。这样的写作方法，不仅让理论的构建有张有弛，也使案例很好地融入到理论的解释之中，从而达到了研究的完整性、连续性和理论与案例之间的交融性，是实证研究的一种典型手法。

① [http://en.wikipedia.org/wiki/Recognition\\_\(sociology\)](http://en.wikipedia.org/wiki/Recognition_(sociology)) (最后访问时间：2010年7月20日)。

② [http://en.wikipedia.org/wiki/Legitimacy\\_\(political\)](http://en.wikipedia.org/wiki/Legitimacy_(political)) (最后访问时间：2010年7月20日)。

③ Yong Deng, *China's Struggle For Status: The Realign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ix.

④ Cho Youngnam, "Book Review of *China's Struggle for Status: The Realign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History*, Vol. 5, No. 2, 2008, p. 220.

⑤ Cho Youngnam, "Book Review of *China's Struggle for Status: The Realign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220.

⑥ Gerald Chan, "Book Review of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The China Journal*, No. 60, 2008, p. 152.



当然，作者的研究也并不缺乏可取之处。如果说理论与案例之间的鸿沟是本书的明显缺陷的话，那么，对中国外交政策全面、准确的把握则是该书的最大亮点。作者在书中用了六个章节，分析了中国在应对人权问题、“中国威胁论”上的反应，中国的大国关系和多边外交实践以及中国政府的对台政策，因此该研究的详实、全面可见一斑。本书的研究也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当前中国迅速崛起，然而国际社会对中国充满质疑和恐惧，对于中国将以何种方式崛起，外界充满了关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作者适时地以中国寻求“国际地位”为切入点，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准确的分析定位，有力地回应了西方对中国的种种不合理、不准确的想法。作者不仅对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有很深刻的理解，同时又对西方社会和学界的对华态度有很全面的了解，所以这本英文专著能够为国外民众和学者“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复杂动因提供客观、全面的分析”，“而不像现在市场上的很多书一样，一味地对美国读者宣扬中国是（继苏联之后的）下一个重大威胁”。<sup>①</sup>同时，本研究对大国寻求国际地位方式的探讨，对我国的外交实践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它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在崛起过程中的国际环境十分复杂，中国对国际地位的寻求不仅仅需要物质实力的坚强后盾，更需要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承认，因此我们积极构建能够被西方社会接受的国家“认同”，积极寻求大国权力的合法性是追求国际地位的必经之路。

综上，虽然作者将社会学的“地位”概念引入国际关系的研究，整合现实主义理论与社会认同理论，这些努力本身具有很强的创新意义和研究价值，但是作者并没有将其理论架构明晰化，乃是本书的一大遗憾。没有很好地将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结合起来，导致了本书的结构整体感不强，出现前后的理论与中间案例之间的游离。

#### 四、结语

邓勇的《中国寻求国际地位：国际关系的重新调整》一书是在英语世界发表的对中国崛起这一议题进行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书中作者从“地位”这一新颖的视角研究中国外交，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崛起道路做了分析。

2003年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题为《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的演讲，首次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这一论题，这不仅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国际上对于中国崛起的忧虑。之后，“中国热”持续升温，近年来学术界对此议题的研究成果之丰富足以说明这一话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对于中国的研究现状来说，仍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第一，国内学者对中国崛起道路问题的研究日渐成熟，对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研究也很丰富，但是我们的“话

<sup>①</sup> Ryuta Ito, "Review of Deng's *China's Struggle For Status: The Realign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ian Journal of Public Affairs*, Vol. 3, No. 2, 2010, p. 107.



语”不能很好地被西方理解和接受，中国的政策和思想不能很好地对外传播，以至于西方对中国的歪曲和误解依然很严重，这是我们的研究与现实需要明显脱轨的地方；第二，“政策宣示毕竟不意味着和平，目前国内学者对以往的霸权周期循环论的批评和否定，其实并没有跳出霸权更替的框架，相反，在这一套路中成了单向否定和自我宣示，显得力量不足。”<sup>①</sup>因此，我们应合理地运用国际关系学的建构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及社会学的“社会认同”、“社会学习”等理论来应对现实主义对大国崛起的主导性解释。邓勇的这本专著既开拓了对中国崛起道路研究的新视野，又为国外读者很好地呈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历史和现状，是值得我们认可和学习的。但是本书写作中理论与案例的脱节这个明显的缺陷则是我们以后的研究中要极力避免的问题。

中国的崛起会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现有秩序，并且与美国等大国的利益发生碰撞，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但是中国将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以实现和平崛起，中国的崛起否将绕过传统现实主义的大国战争这条必经之路，国际社会又将怎么对待中国崛起这样的客观事实，其他正在成长的大国又将对现有的国际格局产生什么影响，中国崛起对这些成长中大国的崛起会有什么借鉴意义，都是我们正在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也许正如作者所言，中国的崛起不会改变现有的秩序，但将改变国际关系的传统观念。<sup>②</sup>

<sup>①</sup> 李华、阎海东：《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和平战略——一种理论分析》，《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118页。

<sup>②</sup> Yong Deng, *China's Struggle For Status: The Realign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ix.



## Nothing Honored, So...

胡悦\*

很高兴能为“海外南开人”的专栏写些东西，也希望借此机会将自己留学这段时间以来的感受与诸公分享。本文没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没有有趣的异国故事、没有浪漫的跨国恋情，甚至没有流畅优美的中文辞藻……有的只是一些实话。所以抱着“取经”、借鉴心态的读者尽可不必看下去了。惟有那些对异国生活的感受抱有些许好奇，并能够接受偏激言论的朋友可以随意看上几眼。

题目用了洋文，是为了起码在形式上不显得过于离经叛道，本来的题目是“在国外，我并不为身为一个中国人而有啥自豪”。这个观点似乎对于我们这些在生命的前五分之一都在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人来说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但我想，真正走出去的朋友多少都会对此有所体会——只是大多数人不屑、不屑或不敢写出来罢了。于是我打算写出来，诸位看官“批判地”看吧……

记得刚踏出国门时，我亦怀揣着一颗火热的心，打算用自己的言行向世界彰显身为中国人的自豪；也随时准备着在某个不开眼的洋人问“Are you Japanese? Or Korean?”的时候，正气凛然地回答“呔！I'm Chinese, and I'm proud of my motherland and my nationality forever!”但真正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却发现，在这里，鲜有机会让我表达这种自豪感，而“中国人”的身份也并没给我带来什么积极的影响。

在学习上，至少在政治学领域你会发现，真正专注于中国研究的学者并不多，实不像国内一直听传的“随着中国的不断富裕与强大以及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关注中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国外掀起了一股研究中国的热潮……”。因此，对于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国学者而言，海外的发展前景并不是多么明朗：你的领域人家不感兴趣，你的背景不会带来什么优势，甚至于你想找到一个真正能指导你学习、为你提供专业意见的导师都非易事，除非像我一样有一个华人导师——而这又是很多未踏出国门却想出国求学的朋友们所不希望的（“我好不容易出国，干嘛还跟个中国人学！”）于是“中国人”的身份带来了些许尴尬：跟洋导师人家认为你只能研究中国，跟中国导师自己却又不甘心因为好不容易来了外国……如果你要是在外国申请更高的 postgraduate 项目的话，你会发现更多来自中国身份的影响。比如，在免除申请费的列表中你永远不会找到中国；反而在递交 test score 的时候，因为你是中国人，没有人会再注意你的 TOEFL 写作成绩，GRE 数学的 800 也被认为是应有的分数——既不具有竞争的优势，也不表明申请人的优秀……

在生活上，身为中国人也不会让你得到什么便利和好处：在租房的时候，很多外国人不愿意租房给中国人，嫌中国人做饭油烟多；在招聘员工的时候，也不是特别愿意找中国人，

\* 作者简介：胡悦，男，加拿大里贾纳大学（University of Regina）国际关系硕士研究生，2009年本科毕业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政治专业。



担心语言问题;在劫犯挑选目标的时候,中国人却是首选,即使中国人已经学会了不带现金,但通常仍然被认为是有钱的“肥羊”……在与洋人的交往中,对于那些对中国不感兴趣的,你们没有话题,因为国外用的 Facebook、Twitter 在中国是被封了的,中国人看的大片是被裁过的,听的新闻也是被粉饰过的;对于那些对中国有点兴趣或有所关注的,交谈过程中你则随时要预备着为自己的国家和政府辩护,用那些磕磕巴巴的英语给他们解释为啥 Google 在全世界都行得通,在中国就不行,为啥在中国记者问个问题会被官员连录音笔都抢走,为啥动不动就封锁消息屏蔽新闻,以及为啥教育不是个公共事业而是个“产业”…… (“这些都不是我们的错,巴拉巴拉……”)即使对这些问题和回答自己多少也都会心存疑惑……

除此以外,在团体集会中,当你看见不论中东人、非洲人、韩国人、倭人都会各自自发地聚成一团时,中国人则是三三两两的这一堆儿那一伙儿;在学生活动中,只有中国学生的组织会卖票;刚来到这里不久,就被前辈告知,外国人普遍都是很友好的,但要小心中国人,因为一般情况下是中国人最会骗中国人;被外国人问起,为啥在这边闯红灯、排队加塞儿、随地乱扔垃圾的多是中国人;到超市偷东西的也多是中国人……哦,顺便讲一个故事,前不久我还是部分实现了最开始提到的“I'm Chinese”情节:一天正在学校走廊里走,两个学生走过来,找我征集签名说要组织空手道社团,希望我签名支持。我顿时发现这是个秀一下自己爱国情操的机会,非常坚定而决绝地跟那两人说:“对不起,我是个中国武术爱好者!”……挺傻的是吧,这事儿确实跟民族自豪感没太多关系,纯属我自己瞎联系而已……哦,顺便说一句,找我签名的两人里跟我对话的那个是中国人。嗯,中国人,用英语,跟中国人说成立一个倭国拳术俱乐部的问题……

总之,经历种种,人生中第一次开始有了一个想法:按照以往的经验,我应当为身为中国人而感到自豪,但能不能告诉我,我应该自豪什么?自豪如上这些?还是自豪民族自立自强而对于一个岛都照顾不周?自豪国家繁荣昌盛而老百姓不仅买不起房,连买个葱蒜、猪肉都心惊肉跳?还是自豪祖国文化悠久而年青一代时有哈韩哈日、羡慕追欧之风?

在一个洋人的电影中看到一句话:这世上只有死亡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其他一切的获致都需要资本,同样地,自豪也要有自豪的资本。而作为一个生活学习在海外的中国人,我深深感到中国人实在还没有到应该自豪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可自豪的:要发展的东西很多,要改进的东西很多,要耗神的東西很多,要奋斗的东西很多……这话或许说的太过悲观、太过极端、太过片面,但我更希望我们的后代,当他们到外国去的时候,不会有机会产生这些悲观、极端、片面的想法——而这大略是我们这一辈该为之努力的吧……

## 聚焦中日钓鱼岛冲突

【编者按】：自9月7日撞船事件中国船长船员被非法抓扣、30日四名日本人闯入河北军事管理区被拘，到随后中国渔政船钓鱼岛巡航常态化，中日船舰东海对峙，又至中日两国内的反日反华事件、美国介入钓鱼岛争端，中日领土争端再次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而10月份以来，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组织的多次反华游行，以及10月16日中国西安、成都等城市发生的涉日游行，似将再度将中日关系推至冰点。夹杂其间，有强硬的态度，有谋求缓和的努力，也有民间与官方的博弈。围绕4.3平方公里弹丸之地的钓鱼岛，中日之间究竟有怎样的较量与周旋？领土争端这一“死结”，会有解开的可能，又将如何影响两国关系，如何引导两国和地区局势的走向？本期煮酒，让我们透过这看似简单的争端，解读中日之间跨世纪的领土弈棋。

### 事件回放

9月7日10时15分许，一艘有15名船员的中国拖网渔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进行捕捞作业时，日本海上保安厅一艘巡逻船赶到现场，并冲撞渔船。随后，日方又派出两艘巡逻船跟踪渔船。13时左右，日本巡逻船上的22名海上保安官登上航行中的中国渔船，命令渔船停止航行，并宣称违反日本“渔业法”，对渔船进行检查。随后，中国渔民渔船被扣押至日本冲绳县石垣岛。



#### 第一阶段：中日反复交涉

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发生后，日方第一时间登船，并扣押船员，随后不久即宣布将起诉船长。中方此后多次与日方交涉，反复提抗议，不同层级多次约见日本大使，但日方不为所动，坚持扣押中方船长，致使中日关系出现危机。

#### 第二阶段：中方采取对日反制措施

日方对于中方各种形式抗议的无视，致使中方不得不采取更为强硬的物理反制措施。中方的反制措施主要集中于暂停交流活动、施加经济影响等，如中方已经暂停双边省部级以上交往，终止了双方有关增加航班、扩大中日航权事宜的接触，推迟了中日煤炭工作会议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让日方感到压力。



### 第三阶段：温家宝对日明确表态

日方有恃无恐的态度背后来源于美日同盟的支持。温家宝到纽约参加联大，利用和当地华人华侨见面讲话的机会，敦促日本政府无条件释放被扣押的中国渔船的船长。他声称，日本方面要为目前的中日关系的局面负全部的责任，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强制性措施，是因为日本方面一直对中国的要求置若罔闻。这番话不仅是代表中国最高层对日本施压，也是说给美国人听的。

### 第四阶段：美国表态——这似乎成为日本做出最后放人决定的催化剂

希拉里：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的范围；

防长盖茨：美国会履行防卫盟国日本的义务；

参联会主席马伦：我们强烈支持我们在该区域的盟国日本。

国务院发言人克劳利：美国不预期中日会因为钓鱼台爆发正面军事冲突；

奥巴马会见菅直人又谈了什么……美国的密集表态，毫无疑问，影响了日本的决定。



### 第五阶段：日本决定放人

日本决定放人的原因，无论是因为受到中方的压力，还是因为自身目标已经达成，客观上都将为事件的最终解决找到一个台阶。钓鱼岛撞船危机已经走入一个新阶段，但事件未来的走向，仍然未卜。

## 中国：韬光养晦？

### 中国怕日本人么？

在船长被扣事件导致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爆发之际，问这个问题似乎有点“挑事”之嫌，但说老实话，无论是那些血脉喷张高喊反日口号的中国示威者，还是威胁要对日本采取“强烈反制措施”的中国政府，恐怕内心里都会不断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中日紧张关系继续加剧下去，真到了两国不得不“摊牌”的时候，中国该怎么办？

近年来，随着中日两国相对国力的一升一降，以旁观者的眼光看，在中国社会日益开放、中国人越来越雄心勃勃之际，日本社会似乎却日益转向保守和封闭。《华尔街日报》记者 Mariko Sanchanta 在《日本白领：拜托永远别派我出国》一文中不禁慨叹，看到一名留学美国的中国青年用一口近乎纯正的英语向他兴奋地讲述今后的打算，还问起了《华尔街日报》，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许久没碰到过这样雄心勃勃、对外部世界充满兴趣的日本青年了。这几乎是明治维新时代西洋人眼里中国人和日本人形象对比的翻版，只不过这一次中日两国人互换了形象。

但如果当事国过分陶醉于这种强弱分明的对比,则很可能使国家政策走上歧途。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之所以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日本决策者看来,中日两国相对国力的此消彼长,已经使日本可以在与中国的“单挑”中轻易获胜,再加上当时苏联、英法因纳粹德国的崛起而无暇东顾,美国又深陷孤立主义情绪无法自拔,遂使日本陡然而生独吞中国的野心。但利令智昏的日本军阀当时或许忘了,虽然彼时中国确实极其贫弱,但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没有一个强国可以容忍其他列强长期独霸中国,所以日本“单挑”中国只是它一厢情愿的幻觉,只要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本质上就是与所有列强为敌,以日本当时的国力,战败投降只是早晚的事。

同样道理,在中日两国当前这场围绕钓鱼岛主权的角力中,中国究竟“怕不怕”日本,并不取决于中日两国相对国力的高低,而取决于中国所代表的国际潮流与日本身后国际合力的相互交锋与妥协。随着以中、印、俄、巴西等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事务中的话语权日益增强,这些国家在国际交往中正变得更加自信,也更勇于伸张自身的权利;但另一方面,这些新兴大国的崛起,势必使其周边国家和那些老牌大国感到紧张,它们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凝聚成一股合力,以图遏制这些新兴大国的自我膨胀。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国际斗争格局远不像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对抗那样营垒分明。比如,印度和东盟作为新兴经济体,它们有在经济甚至政治领域挑战欧美老牌大国的动力,但作为中国的邻国,它们又有与美、欧、日等老牌强权合力遏止中国“过分自信”的紧迫感。

再拿日本来说,虽



力,日本政府在钓鱼岛妥协,但扣留中国渔船本官房长官仙谷由人事冷静处理,认为日本日本在与华争执中能原因之一,无疑是日本增大的依赖。可见,日本既是遏止中国“过分自信”的一支国际力量,又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受益者,在面对中国时,它本身的两种利益就在相互打架。如果经济利益压倒了安全担忧,日本政府会成为中国的某种“同盟军”,它在钓鱼岛主权之争上就更有可能作出妥协;反之,日本政府则很有可能强硬到底。

然同样迫于国内的压主权问题上很难对华的事件发生伊始,日就建议日本政府对此不应对此过于激动。保持一定克制的重要经济对中国市场日益

因此,中日双方如果谁能成功迫使对方陷入孤身与国际潮流或国际合力为敌的境地,它在两国当前这场角力中就有望占据上风。换句话说,中国究竟“怕不怕”日本,关键要看中国能否避免陷入“单挑”日本的迷思。

——《华尔街日报》刘昱

**王燕:** 我认为中日矛盾已经激化,近 中国应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同时寻求联合国帮助。作为学生,我们要理性爱国。



**刘加菲：**钓鱼岛于中日双方都意义重大，当前经济形势下，战争能让美国这样的第三方国家渔利众多，所以他们会努力使事件复杂化。而中国当前综合国力远不如日，所以不管中国民众情绪如何激烈，我政府都会力求和平，而日本政府的态度则相对强硬很多。因而这次事件能否平息取决于中国的让步。

**孟丹：**各国关系受国家利益支配呈现时好时坏的类似周期性的变化。所以中日之间钓鱼岛事件虽然现在事态严重，但不会发生大规模战争，一定会解决的。双方会让步的，但从中国利益出发，还是希望中国会收复钓鱼岛，毕竟钓鱼岛是中国的。

**张力文：**中日关系随利害冲突而不断变化发展，因此必要采取实用外交。区分开官方示好和民间友好交往，前者大可不必刻意追求。

**任娟：**自撞船事件发生以来，中日之间的关系一度跌入低谷。这次东亚峰会上温家宝总理和日本菅直人首相不足十分钟的非正式会谈就体现了这一点。撞船事件不仅将中日之间关于钓鱼岛的争端推到了风口浪尖，更是激起了两国的民族主义。我认为在两国关系出现寒冬的关键时刻，加强两国的民间交流显得尤为重要。民间交流在缓和两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同时还能两国官方的进一步沟通提供条件。

**贺莉莉：**钓鱼岛事件只是中日关系的一个显性表现，中国应该表现出应有的强硬态度，要日本及国际上其他国家知道：中国不是好惹的。

**权贤美：**最近的钓鱼岛事件和多座城市的反日大游行，再一次把国人最为敏感的中日关系推至风口浪尖。日本不顾历史和中国民众情绪，扣押渔民捏造谎言，我们的义愤填膺理所应当，历史必然。但是，单纯的国人愤怒和事后日方的道歉不会起作用，我们强烈呼唤在官方上，中日之间能够通过对话，明确地制定一个规则出来。另外，最想说的，日本海上保安厅舰只永远滚出钓鱼岛海域，中国的外交请再强硬！这不仅是领土问题，更是尊严的维护，崛起的必须。

**潘玉洁：**反日游行有什么用？真的有什么本事把家里的丰田本田索尼松下全砸了，再发誓十年不用日货，真的到了那程度，你不游行日本绝对彬彬有礼地跑来找你。现在的问题是咱没有这个魄力，更没有这个实力。所谓知耻而后勇，如果人人自强，时时自勉，未来的某个日子中国会扬眉吐气的。

**张茜：**钓鱼岛为中国领土毋庸置疑，中国应明确态度坚决保卫领土主权。

**郝丽君：**首先，要理性爱国，勿忘国耻，但是不能把对当前所有的中日事务的观点建立在日本侵华的阴影上，那样将导致观点的片面与偏执。其次，在日本不损我国主权的前提下，中日贸易等事务往来可恢复正常，否则，个人不反对抵制日货和游行活动。

**江育恒：**虽然目前中日两国关系仍然充满变数，但两国民众都更愿意看到中日经济上的“战略互惠”可以促进两国文化上、政治上的“战略互惠”。

**高翔宇：**中日关系事关重大，关系到东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中国在处理东海问



题时需衡量自身实力，尤其是海军作战能力，采取稳步推进的策略，避免刺激日本右翼势力兴起，避免美国的插手干预，放眼长远利益，不计较短时间内的得失。

**冯岱言：**“反日”运动本身就是个笑话，标称自己是华夏好儿女的人连自己祖宗穿的衣服都当成是和服，反日还不如反省自己。有学者说影响国家实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国家动员力，如此看来，所谓“动员”里面也是大有水分的。

**刘鹏：**在钓鱼岛问题上，一方面，国民要保持理智，不能被利用，另一方面，政府应该要疏导国民情绪，而不能一味的围堵，我们要积极谋求钓鱼岛问题的和平解决。

**陈凯：**钓岛问题波澜不惊，外交缺钙已成常态，泱泱大国只靠愤青，而后发展拭目以待。

**李红焯：**中日关系一直忽冷忽热的，好不到哪去，也坏不到哪去。考虑到日本的民族性格，中日友好目前只是个愿望而已，所以在钓鱼岛问题上决不能让步，不能为换取短暂的友好，而丧失根本原则。

**梁哲：**抛开钓鱼岛问题纷繁复杂的由来和发展不谈，这次我看到外交对国内政治不可小觑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内生资源型国家，就其庞大的人口数量，可以造就

### 日本：执迷不悔？

日本对华侵略给中国人留下深深的创伤。在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和领海的议题上，中国政府若做出任何虚弱反应都将受到严厉批评。日本政府应牢记，北京在类似事件上寸步不让是受到公众强大压力。中国强硬立场背后的另一因素是其作为经济强国所获得的新的自信。

日本需要的是一个精明的战略，将中日双边关系牢牢固定在互惠互利上。日本决策者应该学习桥本龙太郎的外交战略。1996年前后，时任首相桥本开始悄悄疏远美国走近中国，

世界第一的市场区位优势 and 总体劳动力优势（包括廉价和一部分高端的劳动力资源），这一直是中国发展前进所依赖的根本，然而透过最近一次钓鱼岛事件，我发现中国阶层的分化板结状况及其严重。也许，失去钓鱼岛及其富饶的资源事小，中国各阶层的资源得不到优化利用才事大。内生资源国家应合理配置内部资源，作为国家强盛的动力，而不是使各种力量相互中和，谋求只符合眼前利益的稳定。一句话，只有优化国内资源，才合理输出国力，这样才能形成我们日益强调的强大的国际影响力。

**张宝平：**以目前中日美三国的实力来论，这个问题不可能解决。领土问题相当敏感，中日两国无论政府还是民众谁都不会妥协。妥协意味着叛徒，卖国贼。此问题，中国急不得，静心、耐心积蓄实力，等中国实力至少超过美国，解决了台湾问题，其他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中国若着急，正中美国的小阴谋，彼时中日都将被美国玩弄于股掌之中，中国不能跟着日本瞎胡闹。目前中国最紧要的问题不是台湾、钓鱼岛和南海，而是如何整合好国内资源，推进民主建设，加强各族人民团结，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充分体现我国制度的优越性，使我国人民真正享受富裕和民主。我想到那时，中国既使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亦会战必胜。

坚持支持中国加入世贸。这令北京感到惊喜，由此对日本怀有非同寻常的感激之情。

华盛顿提高了对北京的批评调门。与中国一样持有巨额美国债券的日本可采取一种与美国稍有不同的立场。日本还可通过外交努力来帮西方和中国弥合在环境问题上的分歧，说服中国加强对日关系符合其利益。

——摘自《朝日新闻》



**刘志：**只要中日存在，那么两国矛盾会永远存在，因此钓鱼岛这“死结”不可能和平解决。但从两国现在紧密的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看，短期内不会迅速破裂。

**姚丽丽：**中日关系虽近日有曲折，但仍会向前发展，因为这是符合两国共同利益的。当然这以日本尊重我国主权

为前提。

**高蕾：**日本误判形势，下大赌注企图翻盘，反遭中国强硬态度，难获利收场。

**温熙：**日本菅直人政府上台时与中国恢复的良好关系是不可以轻而易举破坏的。所以钓鱼岛事件很大程度上是有日本右翼势力煽动的。

**陈名明：**历史遗留、石油利益、大国尊严、未来空间等等，中日的实力对比今非昔比，钓鱼岛问题仅仅是两国之争激烈爆发的一个信号。

## 美国：渔翁得利？

9月25日凌晨，在钓鱼岛撞船事件中被日方非法抓扣长达17天的中国船长詹其雄安然返回祖国。自撞船之日

我往，双方对抗不断  
来自遥远大洋彼岸  
目，美国政府高层  
争端的高度关注，  
半红脸，一半黑脸，



起，北京和东京之间你来  
升级。而与此同时，  
的声音同样引人注  
始终保持对钓鱼岛  
对待中国可谓是一  
大唱双簧。

很显然，本次中日撞船风波并非孤立的突发事件，而是中日之间在钓鱼岛问题上矛盾累积发酵的必然结果。这一事件的发生，同样与美国密切相关。

早在今年8月16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劳利就曾对钓鱼岛问题表态，一方面含糊表达美国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的“中立”立场；另一方面却肯定钓鱼岛适用《日美安保条约》。



美国的暧昧态度显然被日本强硬派解读为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默认支持日本。而日本菅直人政府在国内选举的压力下更是急于修补美日同盟关系，因而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以讨好美国，这无疑埋下了中日撞船乃至对抗的伏笔。

撞船事件发生后，美国一方面做出公正姿态，呼吁中日双方和平解决争端，造成中日双方均有求于美国的舆论态势；而另一方面却又宣称钓鱼岛适用《美日安保条约》，暗示美国将可能军事介入。在撞船事件发生当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劳利宣称，“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没有立场，希望中日两国和平解决争端。”但在9月14日，恰在日本对是否放还中国船长举棋不定之时，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悄然访问东京。作为美国政坛圈内人，阿米蒂奇曾最早主张钓鱼岛适用《美日安保条约》。据报道，面对当时中日对抗逐渐升级的态势，他表示，日本政府“判断准确，反应适度”，并怂恿日本“增加防务开支”及“提升日美联合军演”。

其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国防部长盖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将军也先后表示，美国对亚太地区负有“安全责任”，同样暗示美国不会对中日可能发生的冲突袖手旁观。

身为美国总统的奥巴马虽未直接谈及中日钓鱼岛争端，却也颇具倾向性地表示美国与日本在亚太地区有共同而长远的利益，同时在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威胁制裁中国，并在联合国大会上不点名批评中国，力压中国在中美一些分歧中做出让步。

美国缘何暗中搅和中日纷争？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中日争端很有可能被奥巴马政府利用，成为其加快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的口实。媒体此前已报道，美日将在年底举行联合军演，演习地点包括钓鱼岛附近水域。从“天安号”事件后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加入太平洋战区，到希拉里国务卿游说东盟各国寻求支持，乃至日前美国核潜艇移师日本，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已经初见端倪。

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有能力称霸全球的国家，美国的东亚战略具有相当的扩张性。加强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确保在更多国家的军事准入，成为当前美国东亚安全战略的突出特征。2009年上台的奥巴马更是高调宣称自己是“太平洋总统”，美国将回归亚太地区。显而易见，不论从历史抑或是现实来看，美国始终是亚太地区不可忽视的力量。

——摘自环球网时评

**杨雪：**美国插一腿，打不起来也解决不了，美依旧以此牵制中日。

**姜忆楠：**小小的钓鱼岛，体现了中美日三方战略的博弈。从这一点讲，钓鱼岛事件及最近的中日摩擦有其必然性。除了就事论事，还要造势。

**孙熙隆：**中日钓鱼岛之争体现的是同

源文化下不同历史观念之争，由此可见历史文化对政治的影响不容忽视。

**刘明：**日本人自取其辱却无可奈何——中国今非昔比，惹不起了；美国人笑而不语——我最喜欢你们不战不和了；中国人很矛盾——一国当然得爱，日也是不时要去反一反的，但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咱们要和谐啊！

李磊：对中日钓鱼岛问题，我想，这体现新时期美国队中国乃至亚太地区战略的调整，看似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抬头，实质是美国的幕后操作。大国博弈中，实力最重要。

李金潼：独岛之事，钓鱼岛之鉴，而况美利坚重返亚太乎！

付昊：台湾问题不解决，钓鱼岛问题也就无法解决。目前最好的办法仍然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 综合评论：

### 亚洲不能被几个岛屿阻碍了发展

日本的偏执以及美国的介入，使东亚的岛屿争端趋于活跃。亚洲的注意力被几个岛礁缠住，一个合作的、发展的亚洲似乎正要变成一个愤怒的、对抗的亚洲。这样的变化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东亚作为世界最有活力的发展带已经持续几十年，其间的一些零星冲突一直没能主导这个地区。现在美国来了，首先把地区的注意力往领土纠纷上汇集，对此最不介意的似乎是日本和印度，它们一个是希望保持对中国的经济优势的国家，另一个希望追赶中国。东南亚国家的顾虑要多得多，它们很希望外力平衡中国的崛起，加强它们与中国就领土对话的能力，但它们都走在发展的快车道上，比发达、但停滞的日本更珍惜地区的稳定。东亚纠结于岛屿归属，获益最大的是美国，它将因此节省大量用于分化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资源，用小得多的成本就可以实现“主导亚洲”。面

我们看不见的各种阴谋掉进这些纠纷来一些年里

中国或许斗，但不能沉迷中国要始终牢记么，那就是中国必须加快发

保岛屿属于实现中国崛起的外部强国介入，完成它事实上变得十得高分的。整个东亚都没有解决岛屿纠纷只能探索着往前走。

强硬有时是必须的，但也是最简单的，它的通常结果就是造成争端国之间的强硬叠加。从世界范围内看，弱的一方为了遮弱更容易展示强硬，而大国或实力强的一方则更在意“原则”，由于大国手中有更多杠杆，它们在态度和做法上有保持弹性的可能。

中国在东亚是综合力量最强的国家，但如果东亚的问题“国际化”，就不再是这样。



对扑面而来的种种纠纷，以及算，如何沉着应对，同时不纷和谋算不可自拔，将在未考验中国人的智慧和气度。

不得不一招一式地与挑衅者其中，不能学那些挑衅者，自己的最大战略目标是什展，建设现代化强国。

“规定动作”，但由于有美国这分复杂，不是一个简单招式就能的经验，全世界也很稀少，中国只



总之中国在领土问题上并非“越强硬越好”，中国要做的是，第一要促进问题的实际解决，第二是如果做不到，不要让东亚的岛屿之争走上美国的利益轨道，成为压倒一切的亚洲“头等大事”。

中国人要接受一个现实，目前被日本、越南等国实际控制的争议岛屿，中国短时间内很难将其置于中国的控制之下，就像无论日本多强硬，他们也无法将俄罗斯控制的南千岛群岛变成由日本控制。中国的实事求是精神一定要强于日本，我们不能靠口号过日子。

解决领土问题需要中国的大智慧，中国的表现也应当比小国更有战略性。做一个大国很难，首先难在我们的利益是多元的，有时甚至是相互抵触的。比如为了保卫中国发展的大环境，我们不能让自己的10个手指捏着10个跳蚤，我们还得能攥得住拳头。但在岛屿争端上我们克制的度又在哪里呢？没有标准答案，这个度只能是东亚各种力量和动机的合力。

——（环球网社评）

## 钓鱼岛问题水有多深——兼谈中国政府的应对之策

陈永（09级研）

9月21日，正在联合国参加会议的温家宝总理直接要求日方“立即无条件放人，否则将承担一切严重后果”。这不是例行的外交辞令，这是一国政府首脑对对方下达的通牒。为什么“钓鱼岛撞船”事件由一起常态的外交摩擦上升为中日两国的全面对抗？为什么中国政府为何一再忍让，直到现在才强硬表态？中国政府是不是如坊间调侃的软弱可欺？我们不妨一探钓鱼岛问题水究竟有多深，然后再回顾一下中国的外交决策过程，估计大家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钓鱼岛问题不仅是中日双方的博弈，台湾居于其间却态度暧昧。目前，大陆、台湾和日本均宣布对钓鱼岛拥有主权，但是现状是中国拥有制衡日本的实力，但是没有管理权，一切主权行为只能停留在口头上，顶多派军舰和海监船宣誓一下主权。台湾拥有管理权，但是既无心也无力反制日本。无力容易理解，无心则表现为历史原因造成的媚日情节（相信大家对于《海角七号》深有感触）和现实上台日之间的盟友关系。所以钓鱼岛一出现争端，中国外交部忙不迭的抗议，却鞭长莫及。台湾迫于脸面和民意会与日本演个双簧，大家也经常看到台日舰艇互相对峙和喷水的镜头。而一旦如广大热血青年希望的那样，中日因钓鱼岛开战，会出现台日或明或暗联合对付中国的场面，加之美国在背后协调和支持，中国没有多少胜算。这也是日本历来对中国的外交抗议充耳不闻的要害所在。

钓鱼岛问题水更深的地方在于与俄罗斯卖军火，数钞票不同，美国是东北亚格局的“离岸平衡手”。离岸平衡手就是作壁上观，一旦出手要命的角色。之所以这么厉害，是因为美国具有卓尔不群的实力和东北亚的三边和N边的联盟关系是以美国为核心的。美日韩联盟，日韩是死敌；美日台是联盟，但是日台不敢公开勾结。如果没有美国作为主心骨，东北亚局势不会这么“井然有序”。当然，美国这样苦心经营，主要目标就是遏制中国。可能大家还记得，前段时间美国把中国某军方要员在香格里拉峰会上对美国国防部长所作的强硬表态“南海是





中国的核心利益”转述给东南亚国家引起炸锅，造成中国外交非常被动的局面。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也是东南亚相关国家的核心利益，却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东南亚国家难以跟中国同日而语，只能紧抱美国的大腿。就是这样，半推半就的美国扭一下头都能让中国紧张半天，在钓鱼岛问题上也是这样。日本恨不得把钓鱼岛尽快收入囊中，虽然台湾可以不考虑，但是对面的庞然大物在这一问题上的咆哮让人心惊。此时，美国的一个眼神都能让日本充满勇气。同往常一样，不难得知，日本制造事端，也到了美国的承诺，至少是暗示——放手干，出了事，哥兜着。因此，撞船事件后，中国迟迟不表态，就是想弄清楚，美国介入有多深？日本可以底气这么硬？细心的朋友可能发现，中国有自己的行为逻辑：如果跟东亚国家有冲突，中国会找美国谈，因为老大说话能算数；中美出现纠纷，中国会设法得到东亚国家的支持，这叫分化瓦解。总的目的只有一个，釜底抽薪。这次也不例外，中国对日本说话不断加重，暗地里却与美国在加紧磋商。

东亚国家的一个悲剧就在于过度相信美国的友谊，美国的爱意。相信美国会坚定的支持它们。国际关系是利益和实力的博弈，国家无利不起早，只要价码合适，没有不能出卖的。国家还要衡量风险。美国对中国对钓鱼岛的态度深知肚明，知道这是一张好牌，但是不能让中国掀桌子。所以，围绕钓鱼岛，美国一次次从中国拿到了谈判桌上轻易得不到的东西，就像在朝鲜问题上，美国为了赢得中国支持，也不断忍痛做出难以抉择的让步。因此，日本给美国当枪使却浑然不觉，看不到中美在急剧交换筹码。日本先是说根据国内法将那位可怜的船长拘留十天，如果见好就收，中国将很被动。因为中国没有强烈反应，事实上就是尊重了日本在钓鱼岛执法的权利。中国民间素有强烈的仇日情节，难以容忍政府这么软骨，不满之声早已淹没了庙堂和朝野。中国政府不敢放任民意，不是怕日本不爽，是担心有人借题发挥，酿成事端。日本凭借不合时宜的对华心理优势，对一切都估计错了，做出了延长拘留十天的愚蠢决定。

形势急转直下，台湾也没有了暧昧的空间，中日处在风头浪尖上。中国通过一段时间的忙碌，终于搞清楚了钓鱼岛的水深问题，因为美国没有不好意思，张口向中国要价，哪怕是天价。于是人民币冲高了，朝鲜消停了。日本还没有觉察到形势不对，中美已经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达成了谅解”。在温总理和奥巴马“深入和广泛的交谈后”，他直接要求日本立即放人，不然准备承担严重后果。日本已经骑虎难下，如果妥协，颜面无存；如果硬撑，后果难料。国际政治就是这么现实和残酷，一旦国家弄不清位置，棋子想幻化成棋手，颜面扫地，甚至国破族灭的悲剧就发生了。中国已经不是那个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中国了，也不是色厉内荏，把日本当财神爷的中国了。如果日本不能完成心理转变，坦然面对信心爆棚的新兴大国，东亚国际政治将好戏连台。

## 彼得·乔希姆·卡赞斯坦



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政府系教授。国际关系建构主义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与现实主义的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和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并称为“三K”。

**学术之路：**卡赞斯坦教授 1945 年出生于德国，1973 年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获得博士学位。1987 年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院士，2008—2009 年任美国政治学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主席。2009 年当选为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会员。现为美国康奈尔大学小卡朋特（Walter S. Carpenter）国际关系教授。同时，卡赞斯坦教授也是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Princeto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斯坦福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Stanford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拉塞尔·塞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伍德罗·威尔逊中心（Woodrow Wilson Center）、德国柏林学术研究院（Wissenschaftskolleg Berlin）等机构的研究员，他还是多个学术期刊编委会和多家机构的学术顾问委员会委员。

**研究领域：**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涉及国际关系理论、比较政治学、政治经济学、世界政治中的安全与文化等领域。他撰写并编辑了 30 多部著作，发表了 100 余篇学术论文。近期研究兴趣集中在文明国家的政治问题，包括公共外交、法律、宗教、大众文化、世界政治中的地区主义、德国政治等。

**主要著作：**《世界政治中的文明》（2010）、《超越范式：世界政治中的分析折中主义》（2010）、《世界政治中的反美主义》（2007）、《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2005）、《网络权力：日本与亚洲》（1997）、《被驯服的大国：德国在欧洲》（1997）、《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的警察与军队》（1996）、《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1998）、《社团主义与变革：奥地利、瑞士和工业政策》（1987）、《世界市场中的小国：欧洲的工业政策》（1985）等。

**PS：第一关键词——学术**

**多产：**卡赞斯坦教授是一位非常罕见的多产学者，他不但是比较政治学家，而且是国际关系学家、历史学家，而且他还成功地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为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德国政治、世界政治中的地区主义、安全研究等方面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曾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1986 年度伍德罗·威尔逊美国国际事务最佳图书奖”、“1993 年度大平正芳纪念奖”，他所编辑的《国家安全的文化》被美国 *Choice* 杂志评为 1997 年度国际关系十佳书籍之一。

**开拓：**卡赞斯坦与其他研究者最大的不同在于他能够自由地游刃于国际政治学与比较政治学两个学科之间。例如，几乎所有其他国际关系学者们都承认国家并不是一个“黑匣子”（black box），但很少有人有足够的信心去打开这个“黑匣子”，卡赞斯坦就是为数不多的一位学者。卡赞斯坦在他早期对小国安全的研究和日本研究中，就已经能够将不同层次的分析整合在到同一分析框架中了。同时，卡赞斯坦还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安全领域的先驱。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卡赞斯坦也颠覆了我们传统上对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区域比较分析的理解。

## 第二关键词——南开之旅

对中国国关学界来说，卡赞斯坦教授一点也不陌生，中国学者对他的了解，除了通过阅读他影响深远的多部著作外，还来包括他对中国的多次访问讲学。卡赞斯坦教授和南开有着深厚的渊源。他与我们南开国关的张睿壮教授交情颇深，他的得意门生朱天彪老师也曾在南开国关讲授国际政治经济学，国关系的刘兴华老师的博士论文便是在卡赞斯坦教授和吴志成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



2006 年 3 月 27 日至 4 月 3 日，彼得·卡赞斯坦教授应邀来到了我们南开大学访问讲学。在讲学期间，卡赞斯坦教授举办了一个讲授班和研讨班，分别为我校和来自全国各地百余名师生讲授国际关系理论课程，让大家获益匪浅。同时，卡赞斯坦教授还在南开大学举办了“‘卡赞斯坦对话中国学者’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让更多师生、学者能够与卡赞斯坦教授面对面近距离地交流。张睿壮教授、贾庆国教授、金灿荣教授、潘维教授等来自天津、北京、上海、及武汉等地的十余位资深国际关系学者与卡赞斯坦教授就美国霸权与地区主义、东亚地区安全以及反美主义等问题进行了交流讨论。



这位国际关系领域的知名学者带来的学术交流,为我国学者与国外学术界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尤其有助于开拓有志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青年学者的视野。同时,卡赞斯坦教授身上总是散着对国际关系学科的热情,使我们备受感染。2006年到南开大学讲学时,主办方考虑到他年事已高,每天只安排上午讲课,但是他却坚持上午和下午都要讲课。不仅如此,他每天中午还要求和学生共进午餐,充分利用吃饭的时间与学生交流。卡赞斯坦教授活跃的思维、开拓创新的精神和蔼可亲的性格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使这段南开之旅变得生动而难忘。

几乎所有接触过卡赞斯坦教授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他的精力真是太充沛了”。2009年康尔大学政府系徐昕教授到南开访问时曾谈到卡赞斯坦教授,他坦言,在康奈尔大学,卡赞斯坦教授是出了名的“工作狂”,他充沛的精力让许多青年学生、学者都感到汗颜。在某种意义讲,“著作等身”就是卡赞斯坦教授充沛精力的最好证明。



## 国际关系研究的定量数据库及其应用（一）

陈冲\* 刘丰\*\*

**【编者按】**国际关系研究者经常面对一些需要运用数据进行比较、检验或支持的问题。一般而言，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可以获得相应数据：收集新的数据和利用已有数据。然而，对于大多数研究者来说，第一种方法并不一定可行，因为这意味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而且更重要的是意味着要设计出一套科学、客观、可复制的数据收集程序和方法，使得收集的数据在信度和效度上达到科学研究的水平，这对大多数研究者个人而言也是一个极为艰巨的挑战。鉴于此，面对待解决的经验问题，国际关系研究者首先可以考虑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好已有数据进行研究。但是如何获得和使用这些数据一直是定量研究面临的一个难题。为此，本刊“他山之石”栏目将分期刊载陈冲和刘丰两位作者撰写的《国际关系研究的定量数据库及其应用》一文，限于篇幅，本期将刊载有关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冲突/冲突过程的数据库”，在第4期将刊载“国际经济政治地理数据”、“组织数据和调查数据”等数据库的介绍，包括它们的主要用途、特征、使用方法以及利用这些数据的最新研究成果。

### 一、冲突/冲突过程数据库

战争与和平是国际关系研究最重要的主题。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关于国际冲突、国内冲突、冲突管理以及和平研究等主题的研究成果也是科学化最高、数据最为完备的一个领域。例如《国际研究季刊》1995-2005年刊载的定量分析文章的比例达到了22.5%，同时在这个领域内还有《冲突解决》和《和平研究》两种注重定量分析的顶级期刊。根据冲突研究的性质，我们可以将相关数据分为三类：国际冲突、国内冲突、冲突管理。

#### （一）国际冲突数据

表-1展示了几种与国际冲突相关的数据。使用最广泛的国际冲突数据是COW的“国际军事争端数据”（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 data, MID data）。<sup>①</sup>它收录了“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威胁、显示或使用军事力量的行为”的数据，它对国际冲突的分类包括领土争端（territorial）、政策（policy）和政权（regime）争端三种类型。该数据库最初仅涵盖了1816-1992年的冲突数据<sup>②</sup>，在1993年之后对事件数据进行了系统赋值，目前使用的版本是2004年发

---

作者简介：\*陈冲，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10级硕士研究生；\*\*刘丰，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讲师。

① 关于该数据的详细介绍和下载地址参考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0月28日）。

② 参考 Daniel M. Jones, Stuart A. Bremer and J. David Singer,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 1816-1992: Rationale, Coding Rules, and Empirical Patterns,”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15, No. 2, 1996, pp.163-213.



布的 MID 3.0 数据。<sup>①</sup> 在 2007 年 10 月 26 日更新的 MID3.10 版本中纠正了 2003-2006 收集中出现的一些误差。最近使用该数据库进行研究的是陆凌宇(Lingyu Lu, 音译)和卡梅伦·蒂斯(Cameron G. Thies), 他们研究了贸易相互依赖对国际冲突发生的影响。<sup>②</sup>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C Davis)的齐韦·毛兹在 MID 数据的基础上改进了相关变量, 提供了一种双边(dyadic)版本的数据(Dyadic MID 2.0), 他将冲突方(双边或多边)作为基本的分析单元。<sup>③</sup> 最近毛兹教授使用该数据库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研究了国际冲突与相互依赖的关系, 分别检验了脆弱性相互依赖和敏感性相互依赖对国际冲突发生的影响。<sup>④</sup>

表-1: 国际冲突数据

数据库	主要用途	时间年限	数据格式	比较
COW MID 3.0 data	冲突的发生、严重程度、冲突结果	1816-2001	MS Excel(.csv)	第一, MID 数据中收录的国际冲突事件比 ICB 更多, 这主要是由于对冲突和危机(争端)的定义不同所致; 第二, MID 涵盖的时间跨度更大; 第三, ICB 数据设置了种类繁多的冲突变量, 更具多样性。ACD 相比于前两者, 是基于每年的观察, 而不是汇总数据, 更新更加及时, 区分了小规模冲突和战争。
COW ISC3.0 data	战争的发生、严重程度、战争结果	1816-1997	MS Excel(.csv)	
ICB data	国际危机的发生、严重程度、结果以及危机管理	1918-2007	SPSS(.sav)和 MS Excel(.csv)	
PRIO ACD	武装冲突及伤亡人数	1946-2008	Stata(.dta)和 MS Excel(.csv)	

表格来源: 作者自制

另一种国际冲突数据是 COW 的“国家间冲突数据”(Inter-state conflict data, ISC)。<sup>⑤</sup> 它与 COW MID3.0 基本上是相匹配的, “每一场战争都有它相应的争端”, 而主要不同在于对国家间战争或争端的定义上, 在 COW MID3.0 中, 符合国家间战争的事件首先必须要求参与方是国际体系的成员<sup>⑥</sup>, 其次战争中至少有 1,000 以上的死亡人数。最近黄元载(Wonjae Hwang) 使用 COW 的 MID3.0 和 ISC 3.0 重新评估了国家实力与国际冲突之间的关系, 检

① 参考 Faten Ghosn, Palmer Glenn and Stuart A. Bremer, “The MID3 Data Set, 1993–2001: Procedures, Coding Rules, and Description,”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21, No. 2, 2004, pp.133–54.

② 参考 Lingyu Lu and Cameron G. Thies, “Trade Interdependence and the Issues at Stake in the Onset of Militarized Conflict: Exploring a Boundary Condition of Pacific Interstate Relations,”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27, No. 4, 2010, pp. 347–368.

③ 关于该数据的详细介绍和下载地址参考 <http://psfaculty.ucdavis.edu/zmaoz/dyadmid.html> (最后访问日期: 2010 年 10 月 28 日)。

④ 参考 Zeev Maoz, *Networks of Nations: The Evolution, Structure, and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Networks, 1815-200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forthcoming), chapter 9; Zeev Maoz,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o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cross Levels of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3, No. 1, 2009, pp. 223-240.

⑤ 关于该数据的详细介绍和下载地址参考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 (最后访问日期: 2010 年 10 月 28 日)。

⑥ 确定国际体系中行为体(或者国家)是收集国际关系数据最根本的一个问题, 对于行为体身份的界定不同收集数据会有很大的不同, 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可参考 Gleditsch Kristian Skrede and Kyle Clark Beardsley, “Issues in Data Collection”。



验了国家偏好 (preference) 对冲突和战争的影响。<sup>①</sup>

另一种主要的国际冲突数据是由“国际危机行为数据库”(ICB)提供的危机数据。<sup>②</sup> ICB对国际危机事件的认定包含两个方面:(1)基本的价值观受到威胁;(2)在限定的时间内必须做出反应以及卷入军事敌对的几率大增。<sup>③</sup> 收集这个数据最初开始于1975年,2010年7月发布的最新ICB 10版涵盖了1918年“一战”结束到2007年发生的455次国际危机事件和35次持久冲突(protracted conflicts),涉及了1,000个行为体。ICB的数据包括体系层次(system)和行为体层次(actor)两种数据。由于ICB数据在收录时设计非常全面,涵盖了许多变量,它也得到许多学者的完善和修正,在后面我们将要介绍对ICB中扩展的国际调解数据,它也被广泛地用于冲突管理研究中。最近迈克尔·布雷彻(Michael Brecher)利用ICB数据系统地分析了国际危机的发生、升级和影响因素和后果。<sup>④</sup>

“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UCDP)和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PRIO)的“内战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ivil War)提供了1946年以来的“武装冲突数据”(Armed Conflict data,ACD)。<sup>⑤</sup> 该数据库对武装冲突的界定更加广泛,不仅包括了国际武装冲突,也包括下面要介绍的国内冲突,而且该项目每年都在《和平研究》上发表前一年的武装冲突数据分析。<sup>⑥</sup> 汉内·菲耶尔德(Hanne Fjelde)在最近的一次研究中利用该数据库探讨了产油大国中的政治腐败与内战的关系,发现二者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提醒我们需要谨慎对待资源、政府与武装冲突的关系。<sup>⑦</sup>

## (二) 国内冲突数据

表-2显示了几种主要的国内冲突数据库。前文介绍了UCDP的国际数据,它也收集了1946-2008年的国内武装冲突数据,最近也被学界广泛采用。<sup>⑧</sup> 另一种是COW项目收集的“超国家战争”(Extra-State War 3.0)和“国内战争”(Intra-State War 3.0)数据。<sup>⑨</sup> 这两种数据的主要不同在于,前者收集的是国家与非国家实体之间的战争,后者是国家内部的战争,即政府与非政府实体之间的战争。前者对数据的要求是主要冲突方中至少有一个不具备

① 参考 Wonjae Hwang, “Power, Preferences, and Multiple Levels of Interstate Conflict,”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36, No. 3, 2010, pp. 215-239.

② 关于该数据的详细介绍和下载地址参考 <http://www.cidcm.umd.edu/icb/> (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0月28日)。

③ Michael Brecher and Wilkenfeld Jonathan, *A Study of Crisi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 p. 3.

④ 参考 Michael Brecher,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arthquak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8).

⑤ 关于该数据的详细介绍和下载地址参考 <http://www.prio.no/CSCW/Datasets/Armed-Conflict/> (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0月28日)。

⑥ 参考 Lotta Harbom and Peter Wallensteen, “Armed Conflicts, 1946-2009,”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7, No. 4, 2010, pp. 501-509.

⑦ 参考 Hanne Fjelde, “Buying Peace? Oil Wealth, Corruption and Civil War, 1985-99,”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5, No. 2, 2009, pp. 199-218.

⑧ 例如 David E. Cunningham, “Blocking Resolution: How External States Can Prolong Civil War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7, No. 2, 2010, pp. 115-127;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and Andrea Ruggeri,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 Democracy, and Civil War,”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7, No. 2, 2010, pp. 299-310.

⑨ 关于 Extra-State War 3.0 和 Intra-War 3.0 数据的详细介绍和下载地址可参考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 (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0月28日)。



主权国家身份，并且每一次战争的伤亡人数在 1,000 人以上；后者收集的是发生在一国国土之内的政府与非政府力量之间或者至少两种非政府力量之间的战争。最近迈克拉·马特斯（Michaela Mattes）和布尔久·萨文（Burcu Savun）利用 COW 的国内战争数据研究了 1945-2005 年期间内战中的协定的持续时间与新内战爆发的关系。<sup>①</sup>

表-2: 国内冲突数据

数据库	主要用途	时间年限	数据格式	比较
COW Extra-State War 和 Intra-State War 3.0	战争的发生、严重程度、战争结果	1816-1997	MS Excel(.csv)	ACD 数据对于界定战争的死亡人数（25 人）的要求比其他数据库都低；第二，ACD 观察的单位是冲突而不是国家；第三，ACD 数据对于战争爆发和解决的日期更为精确；MAR 数据观测的国内种族冲突由于变量繁多而更为精细，不足之处是 MAR 的测量是分时间段的。而 PITF 的数据时间跨度太短，这一缺点正好为 COW 的国内冲突数据所弥补。
PITF	种族清洗、国内革命、政治动荡	1995-2008	Stata(.dta)	
MAR	种族冲突、压制、歧视、反抗	1945-2003	Stata(.dta)、SPSS(.sav)和 MS Excel(.csv)	
UCDP&PRIO ACD	国内战争发生、结果和死亡人数	1946-2008	Stata(.dta)和 MS Excel(.csv)	

表格来源：作者自制

另一种国内冲突数据是由“政治动荡工作组”（The Political Instability Task Force, PITF）提供的所谓“失败国家”数据。<sup>②</sup> 该项目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对“政治动荡”的定义包括爆发革命或种族战争、不利的政权变更和种族清洗，涵盖了 1945-2008 年的内战和所谓的“失败统治”数据。杰克·戈德斯通（Jack A. Goldstone）等人最近开展的一项研究根据 1945-2003 年的数据提供了一个预测“政治动荡”的模型。<sup>③</sup> “少数裔风险”数据（Minorities at Risk data, MAR）收集了世界上 1945-2003 年期间 283 个活跃的政治种族群体的活动<sup>④</sup>，它由泰德·罗伯特·格尔（Ted Robert Gurr）于 1986 年建立，经过 5 个阶段的收集，其变量已达到 400 多个，以观测全世界种族之间的压迫和流动情况。该数据被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广泛使用。例如雅罗斯拉夫·蒂尔（Jaroslav Tir）和迈克尔·亚辛斯基（Michael Jasinski）利用 MAR 数据扩展了“转移使用武力理论”，发现当国内领导人的政治生存受到挑战时，更倾向于对国内种族冲突中的少数裔使用武力以获得公共的支持。<sup>⑤</sup>

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国内冲突（内战、种族冲突）的关注越来越多，而且受到行

① 参考 Michaela Mattes and Burcu Savun, “Information, Agreement Design, and the Durability of Civil War Settlem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4, No. 2, 2010, pp. 511–524.

② 关于该数据库的介绍和下载地址参考 <http://globalpolicy.gmu.edu/pitf/>（最后访问日期：2010 年 10 月 28 日）。

③ 参考 Jack A. Goldstone et al., “A Global Model for Forecasting Political Instabi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4, No. 1, 2010, pp. 190–208.

④ 关于该数据库的介绍和下载地址参考 <http://www.cidcm.umd.edu/mar/>（最后访问日期：2010 年 10 月 28 日）。

⑤ 参考 Jaroslav Tir and Michael Jasinski, “Domestic-Level Diversionary Theory of War: Targeting Ethnic Minoriti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2, No. 5, 2008, pp. 641-664.





为主义革命的影响，与此相关的数据库建设也发展迅速，除了前面介绍的这几种数据之外，还有“世界政治与社会指标手册”（World Handbook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Indicators）<sup>①</sup>、“种族战争的隔离方式”（Partition as a Solution to Ethnic War）<sup>②</sup>、“少数裔、暴乱与内战数据”（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Civil War data）等国内冲突数据<sup>③</sup>。

### （三）冲突管理数据

表-3 展示了几种主要的冲突管理数据。在国际冲突调解数据方面，前面已经介绍了 ICB 数据，它在 1977 年建立之初并没有关于国际冲突调解的数据，在 2001 年 25 位学者开始在原有版本基础上系统搜集国际冲突调解的数据，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现在这个包括近 200 个变量的国际危机数据库版本。<sup>④</sup> 另一种常见冲突管理数据是由雅各布·伯科维奇（Jacob Bercovitch）收集的“国际冲突管理数据”（ICM）<sup>⑤</sup>，它涵盖了 1945-1995 年期间的 295 次威胁或使用武力的争端，它们经历了 3,207 种不同的冲突管理形式，其中调停有 1,859 次。利用这一数据产生了一大批关于国际冲突管理的研究成果。<sup>⑥</sup>

表-3: 冲突管理数据

数据库	主要用途	时间年限	数据格式	比较
ICM	国际冲突管理	1945-1995	Stata(.dta)	ICM 数据主要关注的是国际冲突调解, 2003 年补充的 ICB 国际调解数据主要是关注危机调解, 其本身的数据对于危机变量设置较多; ICOW 数据关注的是具体争议问题的管理方式, 更具针对性, 而 TPIID 数据主要是对国内冲突的第三方研究, 相比之下, ICM 和 ICB、ICOW 涉及的都是国际危机或冲突管理。
TPIID-Intrastate Disputes	第三方干预内战	1900-2006	Stata(.dta)	
ICOW	国际争端的问题（领土、河流、海洋争端）	1816-2001	Stata(.dta)、SPSS(.sav)和 MS Excel(.csv)	
ICB	国际危机管理	1918-2007	SPSS(.sav)和 MS Excel(.csv)	

表格来源：作者自制

① 关于该数据库的介绍和下载地址参考 <http://www.icpsr.umich.edu/icpsrweb/ICPSR/studies/07761>（最后访问日期：2010 年 10 月 28 日）。

② 关于该数据库的介绍和下载地址参考 <http://econ.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EXTDEC/EXTRESEARCH/0,,contentMDK:20699324~pagePK:64214825~piPK:64214943~theSitePK:469382,00.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0 年 10 月 28 日）。

③ 关于该数据库的介绍和下载地址参考 <http://www.stanford.edu/group/ethnic/>（最后访问日期：2010 年 10 月 28 日）。

④ Jonathan Wilkenfeld, Kathleen J. Young, David M. Quinn and Victor Asal, *Mediating International Cris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 17. 在这本书中, Jonathan Wilkenfeld 等系统地介绍了 ICB 中的危机调解变量。最近使用 ICB 研究国际调解的一篇文章是 Kyle Beardsley, “Pain, Pressure and Political Cover: Explaining Mediation Inciden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7, No. 4, 2010, pp. 1-12.

⑤ 目前, ICM 数据的获得需要通过电子邮件联系雅各布·伯科维奇教授本人。

⑥ Tobias Böhmelt,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4, No. 4, 2010, pp. 566-592; Tobias Böhmelt, “The Effectiveness of Tracks of Diplomacy Strategies in Third-party Intervention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7, No. 2, 2010, pp.167-178.



另一种冲突管理数据是“第三方与国内冲突干预数据”(TPIID-Intrastate Disputes)<sup>①</sup>, 它涵盖了 1900-2006 年以来所有的第三方对国内争端的干预。第三方包括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IGO)和非政府组织(NGO)。这个数据对“干涉”的定义不仅包括军事干涉,也包括非军事干涉。这个数据还区分了冲突的不同阶段,包括危机前(pre-crisis)、危机(crisis)、冲突(conflict)、冲突后(postconflict)和危机后(postcrisis)。马克·米伦巴赫(Mark J. Mullenbach)和杰勒德·马修斯(Gerard P. Matthews)利用这个数据研究了美国在 1945-2002 年期间对海外的国内冲突的干涉,他们区分了国际和国内因素对美国干涉动机的影响,认为国际因素通常比国内因素的影响更为重要。<sup>②</sup>

另外一种常见的冲突管理数据是 ICOW 的“领土、河流和海权主张争端数据”(ICOW Territorial Claim, River Claim, and Maritime Claim data)。<sup>③</sup> 它涵盖了 1816-2001 年以来西半球和西欧对领土、海洋权利的主张,以及中东、西半球和西欧对河流的权利主张。相比于前面的两种数据,ICOW 数据对于“争议问题”(issues of contention)进行了界定,允许比较不同问题的管理方式及其效果。该数据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sup>④</sup> 例如,托拜厄斯·博梅尔特(Tobias Böhmelt)在文章中利用这个数据研究了调解者的规模(size)对调解的效果的影响,发现二者之间呈现出一个倒“U型”曲线的关系。<sup>⑤</sup>

“危机管理”与“冲突解决”是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的两个热点问题,除了我们前面介绍的几种主要数据库外,还有一些作者自己收集而形成的“复制数据”,这些数据既有关注“国际和平建设”(International Peacebuilding)<sup>⑥</sup>,也有关于“国际领土争端”(Territorial Dispute)<sup>⑦</sup>的管理数据。

① 关于该数据库的介绍和下载地址参考 [http://faculty.uca.edu/markm/tpi\\_homepage.htm](http://faculty.uca.edu/markm/tpi_homepage.htm) (最后访问日期: 2010 年 10 月 29 日)。

② 参考 Mark J. Mullenbach and Gerard P. Matthews, “Deciding to Intervene: An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Influences on United States Interventions in Intrastate Disputes,”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34, No.1, 2008, pp. 25-52.

③ 关于 ICOW 数据的介绍和下载地址参考 <http://www.paulhensel.org/icoworg.html> (最后访问日期: 2010 年 10 月 30 日)。

④ 例如 Paul R. Hensel, Michael Allison, and Ahmed Khanani, “Territorial Integrity Treaties and Armed Conflict over Territory,”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26, No. 2, 2009, pp.120-143; Paul R. Hensel, Sara McLaughlin Mitchell, Thomas E. Sowers II, and Clayton L. Thyne, “Bones of Contention: Comparing Territorial, Maritime, and River Issu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2, No. 1, 2008, pp.117-143; Hansen, Holley, Sara McLaughlin Mitchell, and Stephen C. Nemeth, “IO Mediation of Interstate Conflicts: Moving Beyond the Global vs. Regional Dichotom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2, No. 2, 2008, pp.295-325 等。

⑤ 参考 Tobias Böhmelt, “The Impact of Multi-Party Mediation in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s: Synergy, Conflict, Effectivenes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Theory vs. Policy? Connecting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New Orleans Hilton Riverside Hotel, The Loews New Orleans Hotel, New Orleans, LA, Feb 17, 2010.

⑥ 关于该数据库的介绍和下载地址参考 <http://econ.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EXTDEC/EXTRESEARCH/0,,contentMDK:20701031~pagePK:64214825~piPK:64214943~theSitePK:469382,00.html> (最后访问日期: 2010 年 10 月 30 日)。

⑦ 关于该数据库的介绍和下载地址参考 <http://dvn.iq.harvard.edu/dvn/dv/phuth/faces/study/StudyPage.xhtml?studyId=18738> (最后访问日期: 2010 年 10 月 30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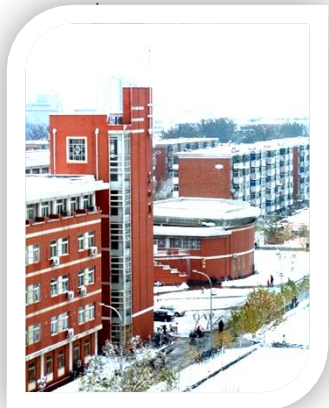


# 南开印象



## 美丽的南开，你的家

“美丽的南开我的家！  
 美丽的南开我的家，我用青春伴随她。  
 大中路旁杨柳翠，新开碧波映晚霞。  
 古钟悠悠铭校史，主楼巍巍塑英华。  
 美丽的南开我的家，我用一生去爱她。  
 敬业广场书声朗，马蹄湖水映荷花。  
 公能校训记心上，月异日新竞芳华。  
 今日湖畔放声唱，明朝建功在天涯……”





## 南开国关的印记

左希迎\*

刚来复旦的时候，在某次饭局上跟李巍闲侃国关圈里的事儿，然后点评国关界的青年才俊们，颇有点煮酒论英雄的味儿。他突然话锋一转：你们南开的学生都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南开真是个奇怪的学校，那么贫瘠的资源却培养了这么多国关才俊，不过可惜的是，往往墙内开花墙外香。听到这番话，自豪之情油然而生，然则高兴之余，却有那么一丝遗憾。

我自然能体会他说这番话时的心境：他的周围，充斥着南开的国关人。在北大的时代，他就认识刘丰和黄琪轩；来复旦的岁月，他又结识了华翔和我。刘丰秉持现实主义，与他分庭抗礼；黄琪轩投身于比较政治经济学，与他在国际政治经济方面有共同语言；华翔是人文主义的信徒，跟他在人文与科学上争得天昏地暗；我倾向于现实主义，但跟他在美国政治与外交政策上也是多有交集。加之简军波、陈小鼎和刁大明，周围的南开人让他对南开小小的国关系刮目相看。

回想这些年，南开国关一直在艰难地进步。老国关人播下的种子，逐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散播知识于五湖四海。除了一些曾在南开国关任教的老师在其他高校搞得有声有色外，南开的学生也逐渐在各路诸侯中打造出了自己的品牌。南开的学生，踏实低调；南开的学生，深刻睿智；南开的学生，能恪守对学术的坚定信仰。南开国关生产了许多青年才俊，他们身上都镌刻着南开的印记。南开大学的张志红老师、复旦大学的简军波老师、中山大学的王学东老师、远在美国的蒲晓宇博士、已经留校的刘丰博士和黄海涛博士、兰州大学的陈小鼎博士，他们都是南开国关人。毕业后回南开两次，加之在清华开会偶遇一些南开的学弟学妹，让我更加坚信，还有更多南开国关人会逐渐增加到这个名单中去。

回想在南开的岁月，自然能够切身体会南开国关的劣势。一方面，那时国关缺少师资。记得 2004-2005 年的时候，那应该是南开国关最艰难的岁月，基本的专业课都很难开起来。对于 04 级和 05 级的学弟学妹来说，这种感触可能更为切肤。另一方面，缺少资源。当然，缺少资源并不仅仅是国关的困境，也是南开的窘境。南开的捉襟见肘与京沪高校的出手阔绰相形见绌，北大有国家的支持，复旦有上海的支持，这两所学校的国关，每个老师的工资待遇、办公环境与课题资源，让人艳羡。即使是南京大学也有海外的资源，清华也可以获得社会资源的支持，而南开却鲜有来自国家和社会的支持。但是，南开国关却一直在进步，这是令人欣慰的。

想来南开在如此绝境之下，竟然能残存，并茁壮成长，自然是有着特定的传统。这些传统，让南开国关一路踏实走来，在资源相对贫瘠的南开、在群雄争霸的中国国关界中铸锭自己的风格。那么，南开国关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为何还能培养出如此众多的国关人才？这

\* 作者简介：左希迎，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2010 级博士研究生，2007 年在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获得法学学士学位，2010 年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获得法学硕士学位。



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我想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这得益于南开的踏实学风。南开的学生踏实，这是被社会各界所公认的。这不仅得益于南开“土气”的历史传统，也得益于南开的办学风格。每一级的南开国关人，总有那么一部分人立志于学术，认认真真读书。时下是个功利的时代，尚能存留南开这类宁静之地，实属不易。依稀记得读本科的时候，虽然不是每个人的人生定位都是做学术，但是大部分人都认认真真读过书，不仅对国际关系的经典文献和主流流派如数家珍，对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也是多有涉猎。正是这种踏踏实实的学风，能够保证每一届总会有一两个优秀的学术苗子。而在上海，就能明显感到这里大学环境的浮躁，大部分人都身陷大潮不能自拔，从大二开始就找实习、做兼职，真正踏踏实实读书的学生少之又少。比较来看，南开国关的土壤更容易造就读书之人。

其次，国关系的课程设置。尽管当时南开国关师资紧缺，专业课不足，但是国关系的课程设置相对很合理。不得不说，这得益于院系老师的独到眼光。国关的课程，看似花哨的专业课极为少见，核心课程却质量相对较高，诸如《政治学原理》、《西方政治思想史》、《逻辑学》、《比较政治学》、《政府经济学》、《中国政府与过程》和《政治地理学》，这些课程夯实了政治学基础；而《中国外交史》、《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理论》、《当代国际关系》、《美国政府与外交政策》、《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等课程，则基本涵盖了国际关系的基本方向。并且，从长远来看，政治学课程偏多对于学术人才的成长，功不可没。这一点与国关强校相比尤为突出，因为国关强校往往专业课占据课程的核心，对政治学的要求相对较低，这明显不利于学术人才的培养。

第三，南开不同级之间的交流。当年南开师资不多，客观上带动了不同级别学生之间的交流，包括本科、硕士和博士。在这方面，刘丰师兄劳苦功高。记得当年刘丰、华翔和袁维杰等创办了个“国关小组”，后来我有幸加入。这个小组每周一次活动，读经典的书，或者针对某一问题讨论。不知现在南开国关系是否还有类似的学术活动，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现在不同级之间的互动比以前只会多不会少。这种交流，对于本科生而言，可以开阔研究视野，为未来的研究做好准备。

离开南开已经三年有余，诸多情势已经有变，回首四年南开生活，最初的离别之情已经荡然无存。时间让一部分情丝慢慢淡化，却让另一部分情缘渐渐厚重，残存的更多是怀念。怀念在南开安静读书的日子，可能怀有如此单纯心态去读书的日子，以后会越来越少了。时常在上海听到关于南开的一切，或者曾经执教于政府学院的老师的消息，这些信息，让我很平静。南开用四年给我刻上国关的印记，我将用一生去沉淀。闲侃这点文字，算是一点感触。



## 初识南开

吕海\*

第一次知道南开是在很小的时候，记得当时妈妈给我讲周总理的故事，就讲到了南开大学。妈妈说，南开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于是小小的我就记住了“南开”这个名字，记住了周总理的母校。然而后来我并没能对南开有更多的了解，所以现在才真正地品味南开。

第一次来到南开大学是今年一月份，我来南开参加自主招生考试，不过由于行程匆忙，并未对南开有更深入的了解。到了九月份，当我再一次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当我开始成为南开人的时候，我知道我将用四年的时光品味南开，内心无比激动。

南开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典雅。南开园里少有高楼大厦，整个校区都有一种怀旧的美，一种沉静的美。古旧的建筑非但没有使南开丧失魅力，反而使它更加端庄。整座校园里都弥漫着古老、沉蕴的气息，让南开大学愈发的典雅。它简直就是穿越时空的美人，让我们感受到中国传统的美，让我们嗅到精致的书香，让每个人都在这端庄的氛围中平静，让校园自立于尘世之外。

南开也是朴实的，特别是我现在学习和居住的迎水道校区。这里少有古迹，也没有本部那么大面积。然而，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南开最重要的品质——质朴、谦逊。饶子和校长的开学典礼讲话中曾经提过，南开本来就有一种“土”的气质。“土”并无贬义，而是对质朴谦逊的高度概括，是一种淳朴的南开式的表达方式。迎水道校区实而不华的建筑、热情的服务人员、甚至操场上飞扬的尘土，都透露出南开质朴的品格，让人们有了心灵的栖息地，让学子们受益终生。

南开更是开明的。在这里，各种思想发生着激烈的碰撞，从而擦出美丽的火花。你可以看到各位大师在这里争辩，看到各位学子面红耳赤的争论。开明的南开，包容了当代各种先进的思想，正是这些开明的思想，让南开的学子学会思考，让南开的知识走在前沿，让南开的学术星火相传。

当然，南开也有它不足的地方，比如略显陈旧的基础设施、略显迂腐的管理模式，但这都不影响南开成为我心中理想的大学。初识南开，我很荣幸，希望我能在南开找到我梦的起点，带我飞翔……

\* 作者简介：吕海，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政治专业 2010 级本科生。



## 南开初体验

曹滢\*

当一年前，那位来自南开的学长在黑板上写下“新开湖”的时候，我不知道一年后的自己会和他一样踏上渤海之滨的这片土地。

9月，在穿过高考的硝烟，在经过三个月的漫长等待后，我终于带着对南开的好奇和对未知的忐忑一路向北。那时候，我知道一个全新的世界在等我去 explore。

**初入迎水道** 我的大学就在这个小而简朴的校区展开了。因为这个地方，在我的人生中出现了许多陌生而可爱的面庞：细心体贴的京欧学长，他是第一个也是后来一直带着我们的人；工作认真的小茵老师，她在军训时对我们严格又不失体贴，在生活中时时温柔地关注着我们；班导海涛老师每次和我们交流都特别随和，像个大朋友一样可亲；还有来自不同地方的同学们，大家相逢相知，共同组成 10 国政大家庭……一切都让远离家乡的我们倍感南开的暖暖温情。

来之前曾百度过关于南开的种种，了解校区设施不如本部，但一年又一年新生们离开校区时总是满怀不舍。我想，可能是这个不起眼的地方承载了太多的故事以及最初的美好回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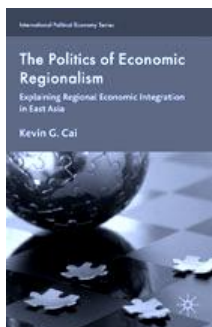
**大学初体验** 向往已久的大学生活在教室—食堂—寝室三点间展开。有课时，抱着课本穿行于各个教室间，那儿会有一位或年轻、或幽默、或博识的老师等待着引你进入一个崭新的知识殿堂；闲暇时，图书馆中一个书香满溢的午后会带给你另一番广阔的天地；而各种各样的学生会、社团活动穿插其间，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紧凑。我渐渐体验到大学的自由精神，不再有人强迫、督促你去做一些事，你想走的道路、你想要的生活，都由你自己的选择来决定。

**梦开始的地方** 学在“小而精致”的校区，我感受到一种特属于南开的朴素低调，那是淡开浮华的深沉气质。在这样一种气氛中，会产生一个想法：南开的确是一个可以安静读书求索的地方，一个可以在静默中升华梦想的地方。

我们选择了南开，南开也包容了我们。南开也许不是最初的梦想，但却是在梦开始的地方。曾经的遗憾渐渐消散，升腾起的是对未来的希冀。

\* 作者简介：曹滢，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政治专业 2010 级本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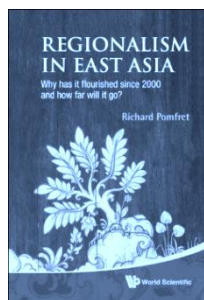
## 新书架（三）



凯文 G. 蔡：《经济地区主义的政治学——对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解读》，贝辛斯托克：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10 年。

（Kevin G. Cai,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gionalism: Explain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既有文献关于经济地区主义的理论主要探讨的是制度化的地区一体化，特别是欧洲的一体化。本书所呈现的分析框架则对东亚地区一体化这一特殊过程和形式作出了解释，作者认为东亚的经济地区主义遵循了一条不同的路径。相比欧洲和北美由政府策划的、高度制度化的地区主义，东亚的经济地区主义肇始于一个自发的、非制度化的过程，它是在市场力量 and 经济发展需要的驱动下，随着迅速增长的地区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动而产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 1997-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为了应对全球化引起的在全球层面、地区层面和国家层面的环境变化，这个过程逐渐包含了一个新的维度，即地区国家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愈加制度化。然而，尽管有了上述发展，但在蔡看来，一个真实的东亚国家区域集团与制度化的地区还相距甚远。



理查德·帕姆弗雷特：《东亚地区主义——自 2000 年盛行的原因及未来走势》，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公司，2010 年。（Richard Pomfret,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Why Has It Flourished Since 2000 and How Far Will It Go?*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 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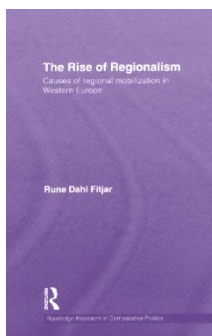
本书考察了东亚地区在 21 世纪头十年经济发展的原因及发展趋势。作者认为，除了东南亚国家联盟外，东亚的地区安排在 2000 年之前仍然处于缺失状态，而 2000 年之后则扩散到了货币和贸易领域。作者把这种政治发展归因于性质正在发生改变的国家经济体，特别是随着生产过程的分解，这些经济体正愈加整合到地区和全球的价值链之中。通过对既有关于东亚地区主义研究文献的考察，本书为读者展现了一条清新连贯的分析脉络。尽管本书是基于对地区主义的理论尤其是经验的分析，但它朴实易懂的写作风格对国际关系、亚洲研究以及经济学领域的读者都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广田胜亦：《东盟安全合作事业——东盟地区论坛内的规范和利益》，贝辛斯托克：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10年。（Hiro Katsumata, *ASEAN's Cooperative Security Enterprise: Norms and Interests in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安全合作事业重要吗？东盟地区论坛是否可以被当作通往亚洲地区安全的路径之一？本书对当代亚洲的安全秩序作出了一个全面而有价值的考察，与传统的现实主义观点即国际和地区制度不过是权力均势的附属物形成了对照。在大多数从事亚洲安全研究的学者看来，由于未能制定任何实现安全的有效措施，东盟地区论坛只是一个毫无用处的“清谈馆”。然而，作者在本书中把有价值的经验研究与严谨的论证相结合，呈现了发生在这个“清谈馆”里的一些“趣事”。作者指出东南亚中小国家的联盟正在推进它们安全合作的规范，从而影响着诸如中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外部伙伴的政策。本书的总体结论是，东盟的安全合作事业确实具有重要意义，东盟地区论坛则是一条通往地区安全的重要路径。对东亚共同体的安全合作来说，东盟的安全合作事业无疑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参考模式。



鲁内·达尔·菲特加：《地区主义的兴起——西欧地区动员的成因》，伦敦/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9年。（Rune Dahl Fitjar, *The Rise of Regionalism: Causes of Regional Mobilization in Western Europ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在西欧过去40年的发展历程中，无论是作为政府单位还是作为政治动员来源的“地区”都变得日益重要起来。本书考察了为什么地区认同在一些地区更为强烈，而在另一些地区则相对薄弱，以及为什么地区精英在特定的时间点上试图就地区议程动员公众。本书聚焦了西欧地区的内生性发展和该地区经济、政治版图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化。作者提出了一个解释地区主义成因的跨时空变化模型，对西欧212个地区进行了定量研究，检验了地区主义与该地区的文化、经济、政治特点的相关性，并通过对苏格兰（英国）和罗加兰（挪威）的案例研究对此问题作出了进一步的探究。对于政治学、社会学的学生和学者，尤其是那些对地区、地区主义以及地区民族主义和领土认同、领土政治等问题感兴趣的读者，本书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巴里·布赞、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潘忠岐、孙霞、胡勇、郑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Barry Buzan and Ole waever, *The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自“去殖民化运动”以来，安全的各种地区模式在国际政治中日益突出，而现实主义的“极性”思想和全球主义的“核心—边缘”理论过于夸大了全球层次的作用，低估了地区层次的重要性。两位作者从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的传统出发，运用可操作性的地区安全理论对整个国际体系进行了经验分析，试图弥合国际关系体系理论家和地区研究专家之间的鸿沟。在本书的地区版图上，世界被分成了四个部分：亚洲、中东和非洲、美洲、欧洲。书中详尽分析了各个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形成和发展，尤其着墨于冷战结束以来地区安全复合体的转型和变革前景。作者将安全的地区脉动同当下有关全球权力结构的辩论联系起来，对冷战后时代的国际安全提出了一种独特的解释。两位作者的分析框架为我们展现了世界不同地区异彩纷呈的安全态势，也为我们考察国际安全提供了新的视角。



蔡定剑：《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近年来有人通过歪曲民主来批判民主，有人以“国情论”来抵挡民主，凡此种种。而这是一位从“官场”走到学界的知名宪法学者为民主作出的强力辩护。如罗伯特·达尔所言，“民主是所有成年公民都可以广泛分享参与决策机会的政治体系”。现行各国的民主已不仅仅是一种国家制度的形态，而且成了一种社会形态和广大公众的生活方式。它不仅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议会讨论和决策，还包括利益集团的影响和街头行动、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参与、第四权力媒体无所不在的监督等。“民主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民主是万万不能的”。本书通过对民主理论的正本清源，阐述了民主的真正价值、民主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民主的发展形式，对反民主的观点作出了回应，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理解、思考民主，以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摆脱对民主的谬误。

（李金潼 龚秀娟 供稿）



## 我想对您说

【编者按】迎水道远离本部，他们无怨奔波；马蹄湖荷花开落，他们无暇驻足。也许左一个十年，右一个十年，学富五车、志在四方的他/她都不曾离开三尺讲台，因为一个个斑斓的梦想需要百倍的爱心和耐心地呵护。然而，师爱如山，爱其高却怨其险。岁月流连，你是否对老师有挚爱、有期待、有怨言、有悔恨，或者一切都不是，仅仅见到老师欲言却又无言。爱需要表达，怨需要沟通。这是本刊的新栏目“我想对您说”——真诚架构师生两岸的心桥。同学们，请拿起笔，写下你的肺腑之言。

- 来南开这么长时间，只见过张老师一面，吴老师也只是见过几次。我们非常希望张老师或吴老师给大家办一个讲座或者讲一次课，让我们感受一下大师的风采，了解一下当前国际关系的发展情况，听一下他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也让他们给我们提一些建议之类，让本科生也能享受到这笔“资源”。

——大二男生

- 祝愿翠翠老师身体永葆健康。

——大三 IR 全体同学

- 阎良老师的课的确能学到蛮多东西的。可是总感觉一下子要接受全英文的概念之类的东西有点难度，我觉得循序渐进会更好些。

——某同学（大二）

- 我对小茵有挚爱，对同顺有哀怨，对久明有怜爱，对梁梁有深爱。

——庞强（大一）

- 别的没什么，就是想和强辉哥（数学老师）说，他能不能讲得不那么抽象，稍清楚一点啊。

——郝丽君（大一）

- 郭道久老师的 PPT 能看得清楚一些吗？黑板上的板书能够不歪着会更好。

——某同学（大二）

- 没事多上课。

——王雨辰（大四）

- 转眼之间，四年即将悄然而过。不经意间，发现自己收获颇多。常常感怀于胸中点墨甚少，图书馆也不曾怎么光顾。常常留恋于南开的一草一木，不知道将以怎样的姿态离开。有幸聆听过这些风格各异的教诲，有张老师的直率、王老师的严谨、小徐老师的博学……走过之后，只想对您说一声：“谢谢”。在南开的时光，是你们引领着我们一步步走过，让我们从一个个懵懂的少年成长为今日的模样，纵然不够成熟，但依旧收获良多。刚刚步入校门时，曾经写过自己的愿望：“四年一觉南开梦，希望梦中有美景。”不知不觉，这美景被自己一步步勾勒，虽平凡而不多彩，但依



旧令人欣慰且值得回味。最后的最后，我与国关擦肩而过，但是，这之中留给我的东西非三言两语而能道尽。对南开，从最初的抱怨，到最后的眷恋，着实感叹时光才是一剂良药。生命中，曾经与这里相遇过一次，曾经与这些人一起留下了珍贵的故事，足矣！

——于洪宇（大四）

- 阎梁老师，您让我领略到了大学里学术的魅力，领略到了自由的芬芳，更让我明白了真实的国关。

——孙晶（大一）

- 数学有怨言，英语有期待，国关有热爱。

——王钰莹（大一）

- 阎梁老师，现在才发现国关很有意思，虽然是被动选择，但会主动学习，哈哈！

——孟丹（大一）

- 印象最深的应该是第一次上王翠文老师 IPE 的课程：讲话特别轻快伶俐，思维特别活跃开放，自己感觉能跟上节奏也是件不容易的事。在选导师的时候，我非常荣幸地成为王老师的学生。面对王老师的认真负责，我也会好好抓紧时间，努力完成王老师给我的任务，我相信和王老师的相处将会是一段愉快而难忘的经历。前段时间王老师由于身体不适而住院一段时间，作为学生我们都非常担心她的身体状况，希望老师多注意身体，一直保持健康的笑容。

——邓子立（研一）

- 我想对阎老师说，您的课幽默感十足，我很喜欢！

——刘葭菲（大一）

- 我们涂涂老师（英语老师）很漂亮，还很温柔！

——贺莉莉（大一）

- 裴裴老师（计算机老师），您是一位很敬业、很健谈、很专业、很有才的老师。但遗憾的是我的计算机基础不是很好，您讲的大部分内容我真的是听不懂啊。

——潘玉洁（大一）

- 希望英语老师把课堂容量扩大。

——张力文（大一）

- 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要加强自己理论与实践结合能力的培养。

——夏昆（大四）

- 有些不完美是注定的，但错过的关键在于自己。多读些书，多向他人请教，自身亦可沿着政治学、方法论、思想史的基础，向国关史、国关理论、IPE 等方向深入学习。

——罗霞（大四）

## 学术交流

## 乔恩·泰勒：美国国会选举——综述与评价

2010年10月9日下午4点，来自美国圣托马斯大学的乔恩·泰勒(Jon R. Taylor)教授在范孙楼116室为大家做了一场题为“美国国会选举：综述与评价”的讲座，讲座由国际关系系赵龙跃教授主持。泰勒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公共行政与政策、中国公共行政、定量方法论、城市政治与政策、城市政府比较、联邦主义与政府间关系等。讲座期间，泰勒教授为各位同学深度解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主要内容、选举程序、选民态度以及两党政策等，并针对本次国会选情对选举最后结果做出预测。其中针对国会选举中的

“中国牌”现象，泰勒教授指出，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在选举中都倾向于以中国议题作为拉票策略，为本党争取更多选民支持。(袁婷 供稿)



“中国牌”现象，泰勒教授指出，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在选举中都倾向于以中国议题作为拉票策略，为本党争取更多选民支持。(袁婷 供稿)

## 迪尔特·莱因哈特：治理全球威胁的国际机制及共同责任和权力政治

10月12日至14日，德国杜伊斯堡大学的迪尔特·莱因哈特(Dieter Reinhardt)副研究员访问我校，为南开师生带来了为期三天的精彩讲座，其总主题是“治理全球威胁的国际机制以及共同责任和权力政治”。讲座由国际关系系的刘兴华老师主持。



10月12日下午，迪尔特教授以讲述自己的第一次中国之行作为开场，并简单介绍了他来中国之前在孟加拉国参加有关治理全球威胁的学术会议见闻。他围绕着“美国与欧洲对国际法和国际制度的不同视角”这一主题，阐述了在治理全球威胁的方式方法上，美国和欧洲所具有的不同偏好。在第二讲中，迪尔特教授提出“是否应该加强联合国遏制暴力的权力”的问题，并对联合国秘书

第二讲中，迪尔特教授提出“是否应该加强联合国遏制暴力的权力”的问题，并对联合国秘书



长潘基文提出的“负责任的主权”(responsible sovereignty)表示赞同。迪尔特教授在第三讲中展望未来,重点论述了全球治理的规则和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阻止环境恶化和气候变暖的有效政策工具。

迪尔特教授温文尔雅的气度和丰富的学识感染了在场师生。同学们纷纷就讲座中的问题向迪尔特教授发问。随着讨论的深入,问题不仅局限于讲座内容而是延伸至欧洲一体化、美欧关系以及欧洲安全等问题。迪尔特教授始终以坦率真诚的态度对答,打开了南开师生了解欧洲和欧洲学术思想的窗口。(刘若楠 供稿)

## 师生活动

### 国际关系系举行 2010 级硕士研究生师生见面会

2010年9月28日下午4:30,我系举行了2010级硕士研究生师生见面会。参加见面会的老师有张睿壮老师、吴志成老师、王翠文老师。见面会由王翠文老师主持。会上,张睿壮老师首先向2010级的17位硕士新生介绍了南开国关系的历史、发展沿革和特色,并对大家在今后的研究生学习提出了一些“严格”的要求。随后,吴志成老师向大家介绍了南开国研究生的培养模式,鼓励大家要多与导师交流,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两年的时光,努力学习。在见面会的最后,17位同学分别选择了自己的学业导师,纷纷表示要牢记老师们的教诲,认真学习,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 国际关系系举行 2009 级硕士研究生开题报告会

2010年10月23日与30日上午8:30,国际关系系2009级硕士研究生在范孙楼440室举行了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会。参加本次开题报告会的答辩的老师有张睿壮教授,吴志成教授,王翠文副教授以及刘丰老师和刘兴华老师。开题人包括2009级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专业的17位硕士研究生。开题报告会的主要目的是考察毕业论文选题情况,确定论文整体框架并由各位老师提出修改意见。从选题的具体内容来看,本届研二同学的选题各具特色,内容涉及美国外交政策、欧洲一体化、全球气候变化等。总的来说,本次开题报告会进展顺利,各位同学都顺利通过了考核,为下一步的论文写作工作奠定了基础。(袁婷 供稿)



## 更正启事

由于作者和编辑部的疏忽，刊登于《新视界》2010年第2期第30—33页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的新进展》一文中第32页的“习惯/实践的逻辑的思想来源于涂尔干(Durkheim)”应改为“习惯/实践的逻辑的思想来源于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作者和编辑部在此对由于疏忽给读者带来的不便致以歉意！

# 国际关系系论文注释体例

## 一、总 则

1. 正文注释采用页下注（脚注），每页依序重新编号。
2. 注释格式：中文字体为宋体，英文字体为 Times New Roman，字号小五，单倍行距。
3. 学位论文后必须列出“参考文献”，课程论文一般不做要求。
4. 所引资料务必真实、准确、规范。

## 二、中文注释

### （一）著作

1. 专著：著者，文献名，卷册序号，出版地，出版机构，出版时间，页码。若出版机构名称已包含地名，不必重复注出。

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01 页。

2. 编著。应在编者姓名后加“编”或“主编”、“编著”。

王逸舟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0-68 页。

3. 译著。在著者姓名前可以“[]”标明著者国别；在文献名之后，可标明译者。

[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六章”。

4. 如著者、编者为二人，两者姓名之间以顿号间隔；如为三人以上，可省略为“×××（第一责任者姓名）等（编）”。

字燕、盛洪：《旧邦新命》，上海三联书店 2004 年版，第 146、158 页。

吴志成、薛晓源主编：《欧洲研究前沿报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陈志瑞等主编：《开放的国际社会：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英国学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9 页。

### （二）文章

1. 文集论文：著者，文章题目（加书名号），文集编者名称，文集名，出版地、出版单位及版次，页码。

[美]威廉·沃尔福思：《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载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9-117 页。

2. 期刊论文

张睿壮：《“人道干涉”神话与美国意识形态》，《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2 期，第 109-117 页。

3. 会议论文

任东来：《对国际体制和国际制度的理解和翻译》，“全球化与亚太区域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天津：南开大学，2000 年 6 月 15-17 日，第 3 页。

4. 学位论文

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论文，1999 年 4 月，第 55 页。

### （三）其他

如引用资料来自政府出版物、通讯社消息、未刊手稿、缩微胶卷等，其注释也应尽量标明编辑者、文献名、出版地、出版机构和时间、页码，或者文献性质、收藏地点、收藏编号等。如无需或不便标明著作者/编辑者，则标明其他类项也可。例如：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53 页。

《中国与八国财长就全球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对话》，新华社莫斯科 2006 年 2 月 12 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研究室:《中国外交——2006年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年版,第560页。

### 三、外文注释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以英文文献为准。其他外文如法文、德文、日文、俄文等文献的释出,可参照相应文献释出的通约惯例。

#### (一) 著作

专著:著者,文献名(斜体),出版地、出版机构及版次,页码。著作者姓名以名前姓后的顺序书写。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 18.

如为编著,则编者姓名后加“ed.”(编者为一)或“eds.”(编者为二人以上)。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

John A.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2003, Chapter 3.

如著作者为三人以上,第一责任者姓名之后可省略为“et al.”(意即 and others)。例如:

Judith L. Goldstein, et al., *Leg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2001, p. 160.

Walter Carlsnaes, et al.,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2002, pp. 354-355.

#### (二) 文章

1. 文集论文:作者,文章标题(加双引号),文集编者,文集名称(斜体),出版地、出版机构及版次,页码。

Joseph M. Grieco, “Reali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Michael W. Doyle and G. John Ikenberry, eds.,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1997, p. 169.

2. 期刊论文:作者,文章标题(加双引号),刊物名称(斜体),刊物出版卷次、期号及年份,页码。例如:

Robert Jervis, “Unipolarity: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January 2009, pp. 188-213.

3. 报纸文章:作者、文章标题(加双引号)、报纸名称(斜体)及具体出版日期,如能注明版面更好。

Joseph S. Nye Jr., “Lessons in Imperialism,” *Financial Times*, June 17, 2002.

#### 4. 会议论文

David Shambaugh, “The Evolving Asian System: A New Regional Structu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East Asia Cooperation and Sino-U.S. Relations”, Beijing, China, November 3-4, 2005.

#### 5. 学位论文

Ruizhuang Zha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Motives: National Interest vs. Ideolog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7, p. 9.

#### (三) 其他

如引用政府或国际组织出版物、通讯社消息、未刊手稿、缩微胶卷等,其注释也应尽量标明编辑者、文献名、出版地、出版机构和时间、页码,或者文献性质、收藏地点、收藏编号等。如无需或不便标明著作者/编辑者,则标明其他类项也可。

Daniel Landau, “The Economic Impact of Military Expenditure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138,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3, p. 55.

### 四、重复引用和转引

### （一）重复引用

如重复引用同一文献，不论中外文，只需注明著作者、文献名和页码。

沃尔福思：《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第 101 页。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12-113.

### （二）转引

#### 1. 中文文献

先将转引文献按上述注释方式释出，以句号结束。再以“转引自”把载有转引文献的来源文献按相应方式释出。

[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与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32 页。转引自胡鞍钢：《中国崛起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81 页。

#### 2. 外文文献

Hans Morgenthau, *Scientific Man vs. Power Politic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6, p. 194. Quoted in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2001, p. 19.

## 五、互联网资料

使用互联网资料时，著作者、文献名称等类项同上述相应体例，同时注明详细网址和访问时间。

《中美联合声明》，新华网，2009 年 11 月 17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1/17/content\\_12475620.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1/17/content_12475620.htm)（最后访问时间：2009 年 12 月 10 日）。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 [http://www.dni.gov/nic/PDF\\_2025/2025\\_Global\\_Trends\\_Final\\_Report.pdf](http://www.dni.gov/nic/PDF_2025/2025_Global_Trends_Final_Report.pdf)（最后访问时间：2009 年 12 月 14 日）。

## 六、参考文献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供制作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时参考。

### （一）中文部分

中文参考文献的书写体例同中文注释体例，文献排序规则如下：

1. 中文作者按照姓氏拼音排列；
2. 译著按照作者中译名顺序排列。
3. 同一作者的多篇文献，以专著、编著、论文为类依次排列，同一类文献按出版时间升序排列；
4. 期刊和文集中的论文须注明起始页码。

示例如下：

1.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2. 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3. 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8 年版。
4.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3 期，第 165-176 页。
5.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6.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一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年版。

---

## （二）外文部分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以英文文献为准。其他外文如法文、德文、日文、俄文等文献的，可参照相应文献的通约惯例。书写体例如下：

1. 第一作者姓名以姓前名后的顺序书写，姓名以逗号间隔；
2. 以第一作者英文姓氏顺序排列，首行缩进 2 字符；
3. 同一作者的多篇文献按出版时间升序排列；
4. 同一作者姓名多次出现以“——”代替；
5. 期刊和文集集中的论文须注明起始页码。

示例如下：

- Doyle, Michael W. 1983.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art II"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2(4): 323-353.
- . 1986.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 (4): 1151-1169.
- Elman, Coli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2001. *Bridges and Boundaries: Historians,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Keohane, Robert O. ed. 1986.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altz, Kenneth N. 1967. *Foreign Polic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 .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 2000.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1): 4-41.
- . 2002. "Intimations of Multipolarity." in Birthe Hansen and Bertel Heurlin eds. *The New World Order: Contrasting Theories*. London: Macmillan. pp. 1-18.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

## 征稿启事

本刊由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主办，现面向广大师生长期征稿：

**一、引介国际关系理论：包括学术论文、书评及新书架栏目。**

**论文习作：**传播研究成果，加强学术争鸣。论证严密，语言流畅，标点符合规范（参考国际关系学系论文注释体例）。字数以 3000-8000 字为宜。

**书山有路：**品茗大师杰作，抒写我辈见解。不是随意的感想，也非勤奋的摘抄，这里是学术的殿堂——严谨客观是首义，独立见解为二德。字数以 3000-8000 字为宜。

**新书架：**放眼全球，把握书界动态。以笔传神，通晓新书梗概。投稿请注明作者、中英文书名、出版社等，以 250-300 字为宜。

**二、关注国际时事动态，“煮酒论英雄”。**

**青梅煮酒：**天下大事谁是英雄，功过是非国关热点任君评说。投稿长短不限，仅盼观点鲜明。

**三、搭建广大师生间交流与沟通的平台：包括“他山之石”、“院系新闻”栏目。**

**他山之石：**经验交流，心得汇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字数不限，畅所欲言。

**院系新闻：**或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学术沙龙，或是一次印象深刻的社会实践。欢迎报道院系活动，展示院系风采，200-500 字为宜。

这是一个飞扬着激情与梦想的舞台！

在这里，你可以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在这里，你可以畅游天地，飞跃古今；在这里，你可以重塑思想，锻造灵魂！

在这里，你可与所有今时的国关学者对话；在这里，你可与所有不远的国关研究共行；在这里，你可与所有未来的国关方向同步！

这是一本杂志，但它的读者也是它的作者；这是一部刊物，而它的存在就是它的意义！

如果，你觉得前面的话都是夸大其词，那么，请你拿起你手中的笔——因为只有你，能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来稿请发送至 [nkirjournal@gmail.com](mailto:nkirjournal@gmail.com).

## ♥保卫钓鱼岛♥

当那海面泛起了波涛，还有座思念的岛礁，  
在那风雨之中飘摇，让我不能够忘掉。

那是母亲留下的伤痛，为儿女们刻着记号，  
虽然远在天涯海角，仍是中国的坐标。

烈焰高高，燃我热血的火苗；

巨浪滔滔，掀我爱国的狂潮。

保卫钓鱼岛，赶走贪婪凶残的强盗，

捍卫我们美丽的家园，夺回被抢的珍宝。

保卫钓鱼岛，掀起巨龙悲怆的风暴，

誓在世界东方崛起，使龙的传人感到——

无比骄傲！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主办